

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

何義麟**

摘 要

日治時期臺灣青年赴日求學，原本是日本帝國領域內的升學，戰後因國籍變更而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的留日學生，這個變化影響到每個人的前程。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畢業後是否順利歸國就職？政府是否接納這批臺灣青年？透過口述訪談與相關史料考察發現，時局變動阻斷了大部分臺灣學生的返鄉之路。首先，因二二八事件之衝擊，加上日本社會與僑界左傾言論的激盪，臺灣青年自始即對國民黨政府抱持負面評價。1949 年間，國府因內戰潰敗而遷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許多臺灣留學生對「新中國」抱持高度的期待，不久甚至出現集體前往中國之現象。透過學生報與僑界刊物內容分析可知，僑界的左傾言論是催化臺灣學生親共的原因，但不可忽視這股風潮是由在日臺灣人所主導，其背後雖然曾受到共產黨宣傳的影響，但國府的失政引起留學生反彈，也是一項重要的因素。整體而言，戰爭期赴日學生，若戰後繼續在日升學，大多就此定居日本；其中少數返臺之學生，縱使未曾遭到迫害，也很少獲得政府重用。從日後的演變可以看出，留日學生的左傾風潮是臺灣本土菁英預備軍大量流失的原因之一，左傾風潮的產生過程雖已釐清，但個別人物的思想轉折及本土菁英流失之影響等，尚待日後持續地探究。

關鍵字：臺灣留日學生、在日臺灣人、中國留日學生報、日本華僑、新聞宣傳、左傾言論

* 本論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臺灣人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8 月 25-26 日），原題「戰後臺灣留日學生的言論活動與進路選擇」。感謝評論人黃福慶教授，以及與會學者之指正。投稿後依照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意見修改，並獲編輯委員會諸多協助，謹此誌謝。這項研究是筆者進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戰後在日臺灣人之組織與活動」之部分成果（計畫編號：98-2410-H-152-016），研究過程中承蒙多位當事人提供資料並接受訪談，留日前輩的熱情是筆者寫作的動力，謹此向打擾過的前輩們致上深謝之意。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來稿日期：2011 年 9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3 月 12 日。

- 一、前言
 - 二、清華寮與臺灣學生聯盟之成立
 - 三、留日學生報言論內容之變化
 - 四、在日臺灣人與學生報言論之左傾化
 - 五、留日同學會支持中共政權之演變過程
 - 六、結論
-

一、前言

日治時期，許多臺灣青年前往日本各地求學，越到晚期人數越多。根據統計，戰爭時期臺灣赴日求學人數維持穩定，人數並未如中國學生因戰爭爆發後返國而大幅降低。戰後，不少臺灣留學生陸續返鄉，但估計 1946 年底大約還有一千多人留在日本求學。敗戰後的日本，百業蕭條生活物資匱乏，求學環境不佳，此時臺灣學生為何選擇繼續升學？若為了完成學業而留下，數年後畢業是否就選擇束裝返臺？還是現地就業成為僑民甚至歸化日籍呢？對留學生而言，這是最重要的進路選擇問題。臺灣青年赴日求學，原本是日本帝國領域內的升學，因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他們才被納入國府¹管轄。最初臺灣學生並未排斥變成中國留日學生，但是，經歷二二八事件的衝擊後，許多青年學生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抱持負面評價，對於中國駐日代表團的舉措更有諸多不滿。1948 年以後，國府在內戰中潰敗而共產黨崛起，加上日本文化界與學界左傾言論之激盪，許多臺灣學生選擇支持「新中國」。不僅是青年學生，被稱為「新華僑」的在日臺灣人，也同樣出現支持中共政權的變化。

¹ 本文「國府」之簡稱，適用於「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1948 年中華民國實施憲政之後，雖然國民政府解消，但是在動員戡亂體制之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無異於訓政時期之「以黨領政」統治。因此，三者時而交互運用，並皆以「國府」簡稱之。

戰後在日臺灣人為何會出現左傾化的現象？在臺灣尚處於戒嚴時期時，這個問題原本就比較難以探究。解嚴以後，學界對於興起於日本進而擴及全球的臺獨運動較為關注，有關戰後初期，眾多在日臺灣人左傾之現象，仍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留日學生言論思想左傾的問題更是鮮為人知，這段史事雖被淡忘，史料也殘缺不全，但其重要性卻不容忽視。有關戰後國共兩黨爭取青年學生支持的爭奪戰中，共產黨取得優勢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然而，在海外，特別是留日學生的爭奪戰，共產黨如何取得全面的勝利，並未獲得充分的認知與理解。更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政府遭到唾棄，不僅在中共建國前後時期，接續的 1950 年代前半，還有大量日本華僑與青年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前往大陸建設所謂理想的「新中國」。而且，從日本前往中國者，不論華僑或青年學生，臺灣人所佔比例相當高。留日臺灣學生畢業後，即使沒有前往中國，也很少人願意返臺。為何如此？若能深入探討留日菁英的言論與思想變化，並追蹤其日後的動向，應該可以釐清部分臺灣史研究上的謎團。到目前為止，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大致都還限於島內本土菁英言之討論，但他們因二二八事件的震懾而沉默，白色恐怖時期又喪失發言機會，以致其思想與行動上較為隱晦不明。因此，如果能參照海外臺灣人的言論與政治動向，必然能進一步觀察分析臺灣政治史之演變。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戰後臺灣留日學生為何出現左傾化的現象，應該是臺灣政治史研究必須關照的問題之一。

近十餘年來，有關戰後初期中國與臺灣留日學生問題，除了有不少相關的史料出版，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發表。史料方面最主要的突破是教育部日本留學教育事務檔案的出版，主編林清芬同時也發表專論，充分地釐清戰後國民黨政府「召回並甄選」留日學生之政策。² 日本方面，主要有東京大學川島真之論文，他運用臺灣出版的檔案，並解讀留日學生報，針對戰後中國與臺灣留日學生的動向，提出相當深入的分析。³ 此外，中國旅日學者王雪萍也利用中日雙方史料與口述訪談，探討留日學生為何在 1950 年代大批回到中國的現象，大致釐清其政

² 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2001），留學日本事務（一）、（二）；林清芬，〈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國史館學術集刊》10（2006年12月），頁97-128。

³ 川島真，〈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收於劉傑、川島真主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31-51。

治傾向轉變的內外因素。⁴ 然而，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都是利用官方檔案，雖然可以了解政府之留學生對策，但留學生自身之意向則無法探知。川島真針對學生刊物內容進行分析，部分觸及臺灣學生的思想變化，王雪萍針對中國各省出身的留學生進行訪談，討論不少有關學生進路選擇問題，但有關臺灣學生的動向則未深入討論。因此，本文將立足於前述的研究基礎，以戰爭期赴日的臺灣留學生為焦點，針對他們言論與行蹤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設定以臺灣籍留學生為研究對象，首先必須掌握留日學生的人數、籍貫、就讀學校等基本資料，如此才能檢視他們的言行與動向。根據前述已出版的《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兩冊史料專書，1949年底到1950年初，駐日代表團曾補助留日學生，留下詳細的接受補助人員名冊，名冊中詳載年齡籍貫就讀學校等資料，人數共計404名，其中265名籍貫為臺灣。另外，根據筆者從口訪對象取得的「舊臺灣留日同學會會員名簿」與「清華寮OB會」⁵之會員住所與現況等資料，人數超過220名。⁶ 剔除與教育部補助名單重複後，可掌握其基本資料與動向的臺灣留學生，大約超過300名。雖然可掌握資料的人數筆者推估約僅三分之一，但透過這些活躍分子之動向，大致可看出整體之趨勢。有關留學生思想言論的分析，主要是以《中國留日學生報》⁷的文章為主，因為較活躍的學生會幹部，大多曾在這個刊物發言。而且，學生報中也有各類集會活動與各宿舍近況的報導等，對於釐清臺灣學生的思想變化與動向，也有相當大的助益。當然，也必須盡量運用其他文獻來比對與補充，如此才能更完整地掌握留日學生報的撰稿者身分與日後的動向。

⁴ 王雪萍，〈留日學生的選拔：「愛國」と「歴史」〉，收於劉傑、川島真主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頁203-232。

⁵ 該會成立於2002年4月，同年發行會報。「OB」一詞是日本特有的英文，「Old boy」的縮寫，即所謂的「和製英語」，若是女性則稱「OG」（Old girl），大多指同學校畢業的校友，在此指清華寮宿舍舊友。

⁶ 蔡朝忻，〈蔡朝忻先生手稿文件集〉（未刊稿）。文件集彙整蔡先生提供之手稿與文件之外，也進行口述訪談，其中也包含相關之名簿。蔡朝忻，1925年生，彰化人，1938就讀明治學院中學部，1944年進入青山學院工科專門學校，戰後入住清華寮，參加留日同學會。1947年畢業就職後，持續參加政治運動，被中華民國政府列入黑名單，直到1993年才得以返臺。請參見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之處境與認同：以蔡朝忻先生的經歷為中心〉，《臺灣風物》60:4（2010年12月），頁161-194。

⁷ 學生報於1947年1月31日創刊，刊名為《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5月1日改為《中華留日學生報》，隔年5月4日改為《中國留日學生報》，此刊名延續到1960年代停刊為止，從中華民國、中華到中國，其變化也象徵了有意擺脫中華民國政府的過程。學生報與戰後初期臺灣人與華僑發行的報刊雜誌，部分收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プランゲ文庫」，提供一般民眾閱覽。

本文以 1945-1949 年間臺灣學生言論與活動為焦點，探討其左傾化的演變過程。但是，同時也將觸及華僑的動向，因為兩者的行動具有聯結關係。戰後，在日臺灣人與日本華僑隨著遣返作業的進展，人數有相當劇烈的變化，以 1950 年前後較穩定時的人數為準，包括華僑與學生以整數估算不會超過五萬人，其中半數為臺灣人。在日臺灣人受過較完整之學校教育，具有專業技術者比例較高，而中國人則以勞工、餐飲業者與商店經營者居多。從居住區域來看，華僑大多居住在東京橫濱地區與京都大阪神戶地區，第三位集居地為長崎，在日臺灣人則較集中於東京與神戶兩地。臺灣學生分布日本各地，但人數最多的還是東京地區，此外大阪與京都也是較多留學生聚集之處。⁸ 日本華僑與世界各地華僑相同，原本各地就有許多以同鄉同業網絡組成的幫公所等團體，但是較特別的地方是，戰爭期全日本統合性華僑聯合會已被迫成立，戰後體系化華僑團體也被承接下來。戰後，人數眾多的臺灣人也成為華僑，參與華僑社團。為了加以區隔，一般稱大陸出身被稱為「老華僑」，臺灣人則被稱為「新華僑」。兩者赴日歷史經驗不同，教育背景與職業等也差異甚大，當然也會出現一段磨合過程。有關戰後華僑社會的整合與變遷問題，陳來幸與許瓊丰已有深入的探討。⁹ 兩位學者雖然都以神戶地區華僑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全日本僑界的動向也有完整的介紹，同時更詳細地討論臺灣人的角色與定位。臺灣人與中國出身者的磨合問題，不僅發生在各地華僑組織，學生組織也不例外，故兩類團體之摩擦與整合過程，皆值得深入探究。

戰後，日本華僑成員中半數為臺灣人，他們大多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商人，或出身這類家庭子弟的留學生，他們進入僑社之後，不少人都成為主導僑社動向的核心幹部。而所謂中國留學生，基本上包含臺灣出身者、中國大陸出身者（大多為滿洲國、汪精衛政府、內蒙德王政府等派遣之留學生）、華僑子弟等三大類。其中，臺灣學生總數超過一半（中國大陸出身者較集中於東京地區，約佔該地區留學生半數），同學會幹部臺灣出身者佔半數以上。筆者估計，由於戰爭結束後大批臺灣留學生陸續返鄉，人數減去大半，到 1947 年初學生報開始發行時，在學

⁸ 戰後日本華僑與在日臺灣人的人數有各種統計數字，但何者較為準確很難判定。本文不擬詳加比對討論，此處推估之數據，主要參見菅原幸助，《日本の華僑》（東京：朝日新聞社，1991），頁 111。

⁹ 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日本神戶華僑的社會變遷〉，《臺灣史研究》18:2（2011 年 6 月），頁 147-195；陳來幸，〈在日台灣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戦後神戸・大阪における華僑社会変容の諸契機〉，收於貴志俊彦編，《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地域社会と「外国人」問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頁 83-105。

的高等或專門學校以上臺灣學生約近一千人，來自中國大陸各地與華僑子弟學生約五百人。本文討論的主要對象，就是這批就讀高等或專門學校以上之留學生。當時這群留日學生對「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抱持何種態度？學生會重要幹部吳修竹在回憶錄中表示：戰爭結束時，在日本的留學生都是「南京政權」、「滿洲國政權」、「德王政權」派來的學生，他們對「國民黨政權」的感覺如何或有何關係？讓人很難理解。而戰時居留日本的華僑，其心情似乎也很複雜。唯一可斷定的是，臺灣人確實打從心底歡迎「祖國的代表」。¹⁰ 這段描述顯示，此時臺灣學生國家認同既無困擾亦無分歧現象，吳氏的證詞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後，直到 1950 年底為止，戰後世代的留日學生尚未正式抵達，在學人數隨時間變化遞減，討論他們 1945-1949 年間畢業前後的動向，正好也可檢視那個時代的變局。

二、清華寮與臺灣學生聯盟之成立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後，日本戰敗的消息在各地傳開，許多在日臺灣人立即積極地進行組織化工作，試圖以團體交涉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首先，臺灣留日學生迅速集結，經召開兩次預備會後，同年 10 月 28 日，「臺灣學生聯盟」在東京女子大學講堂召開成立大會，入會的成員約達二千名。有關學生聯盟成立過程，目前公開的出版品中，日本華僑華人研究會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一書已有完整的描述，但為何臺灣學生如此迅速成立卻未見說明。¹¹ 根據聯盟幹部林鐵錚的描述，1920 年代起就讀早稻田大學的臺灣學生早已組成「瀛士會」，其他各校也有類似的臺灣學生會，戰後擺脫特高警察監控後，大家才積極聯絡並一起組織跨校學生會，這是聯盟誕生的歷史背景。¹² 1942 年 4 月，林鐵錚考入早

¹⁰ 吳修竹，〈私の履歷書〉（自製版，1997），頁 15。原文日文，筆者中譯，日文漢字「政權」一詞，保留其原文。吳修竹，1922 年生，彰化人，開業醫吳起材之子，私立成淵中學畢業後，1943 年進入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就讀，戰後擔任同學會幹部，1947 年進入「留日華僑總會」任職，長期擔任支持中共的華僑團體之核心幹部。

¹¹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琦玉：日本僑報社，2004），頁 54-67。

¹² 林鐵錚，1926 年生，臺中人，祖父為臺中士紳林耀亭，1938 年臺中第一中學校畢業，1942 年就讀日本東京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戰後投入學生聯盟之籌組，1947 年早稻田大學畢業，1956 年搭乘興安丸前往中國。採錄蔡朝斯先生轉述林鐵錚先生回憶錄之內容。

稻田第一高等學院後，先擔任瀛士會幹事而後接任委員，當時早稻田大學包括學部、專門部、實業部、高工等，全校 5 萬多名學生中，臺灣人約 120 名，足以成立較具規模的學生會。1944 年 10 月他升上理工學部，為了抗拒針對文科生實施的志願兵制度，曾與各校臺灣學生會祕密聯繫。戰後，他深感統合各校學生會之必要，首先聯絡臺中一中同學且正就讀慶應大學醫學部的林瑞聰，獲得其贊同後兩人分別聯絡各校學生，10 月初召集各校代表舉行過 3 次籌備會後，28 日才舉行成立大會。¹³ 從這段證言可知，戰前各校個別學生會早已存在，同時也有私下的聯繫網絡存在，各校整合後依照當時習慣稱之為「聯盟」。

學生聯盟成立後，執行委員會決定以清華寮為活動據點。該宿舍原為臺灣總督府管理的「高砂寮」（東京文京區茗荷谷車站附近），戰後馬上被臺灣學生接收，並開始自主之營運。學生接管後，經曾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陳蔡煉昌¹⁴ 提議，宿舍更名為「清華寮」。住在該宿舍的學生約 40 多名，其中包含多位聯盟主要幹部。1945 年 12 月 1 日，聯盟召開各學校代表委員會，選出第一期幹部名單如下：委員長羅豫龍、副委員長魏金治、總務部長林鴻德、企劃部長李舜卿、涉外部長葉盛吉、文化部長林瑞聰、厚生部長康嘉福、宣傳部長江惟仁、調查部長洪山海、連絡部長吳修竹。隔年因葉盛吉等部分幹部返臺，三月間進行部分幹部的調整：副委員長林瑞聰、總務部長林良立、涉外部長吳修竹、文化部長蔡慶播、宣傳部長張順安、調查部長洪山海、聯絡部長蔡朝圻等。¹⁵ 聯盟成立後，除了積極爭取生活上的權益之外，也相當重視文化活動，早在 1945 年 11 月 11 日，聯盟即發行機關誌《龍舌蘭》創刊號，預定每個月發行一次，由林鐵錚主編，第一卷發行 5 期，隔年 5 月發行到第二卷第 2 期後停刊。第二卷起由李子聰主編，其內容主要都是刊登學生的隨筆、論文等。¹⁶ 此時的臺灣學生尚未意識到中國內部的

¹³ 採錄蔡朝圻先生轉述林鐵錚先生回憶錄之內容。

¹⁴ 根據 2006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六十週年時完成的編年史稿記載，陳蔡煉昌 1912 年生於臺中豐原。戰後，自日本返臺後，1946 年 7 月 1 日起擔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專修科教授。

¹⁵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56-57。本文中列名幹部，除了葉盛吉之外，其餘皆未返臺，他們的生平事蹟尚待查證。學生聯盟還聘請顧問，名單如下：高天成、謝國城、陳文彬、廖秀鑾、黃宏基、王金茂、蔡慶榮、陳蔡煉昌。這批顧問部分返臺後尚能發揮所長，部分人士行蹤不詳，其中返臺的陳文彬與蔡慶榮於二二八事件後逃亡到中國，蔡慶榮改名為蔡子民，其弟為聯盟幹部之一的蔡慶播。有關葉盛吉返臺後的行跡，請參見楊威理，《ある台湾知識人の悲劇：中国と日本のはざまに：葉盛吉伝》（東京：岩波書店，1993）。

¹⁶ 採錄蔡朝圻先生轉述林鐵錚先生回憶錄之內容。

紛爭，機關誌文章都是文藝與學術類作品，並無時局論評或政治主張之言論。

另一方面，東京地區中國學生也籌組學生會。當時中國留學生以汪精衛政府派遣的學生最多，集中居住於大東亞學寮（戰後改為中華青年會館），其次是滿洲國留學生，集中居住於滿州會館（後樂寮），此外還有其他管道來日之留學生，集中住在幾個較小規模的宿舍。1945年11月26日，東京地區中國留日學生齊聚中華青年會館，舉行「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東京同學會」成立大會。該會成立後，除了爭取學生應有的配給與救濟金之外，也積極聯繫日本各地同學會，計畫籌組留日學生總會。經過與地方代表召開幾次準備會之後，1946年5月22日舉行「中華民國留日同學總會」之成立大會，駐日代表團第二組副組長謝南光親臨致詞。¹⁷留日同學總會之外，各地方也都成立區域性同學會，總會與地方學生會並無嚴密的從屬關係，大致維持著鬆散的聯結而已。

同學總會創立之前，臺灣學生聯盟與中華民國東京同學會已經有所接觸，並洽談合併之事。從口述訪談與相關文獻可知，由於雙方領導幹部的求學背景差異甚大，整併並不容易，雙方經過多次的商談，才逐漸確立合併之共識。確定進行合併後，首先以東京同學會為第一部，學生聯盟為第二部，1946年10月6日召開兩部聯絡會議，12月23日在青年會館舉行正式合併大會。東京兩個同學會決定合併後，留日學生總會正式選出幹部，選舉前雙方幹部達成協議，由東京同學會主席出任同學總會主席，臺灣學生聯盟委員長出任副主席，幹部則大致各佔一半。由於交通與聯繫上的限制，總會的幹部大多是由東京地區學生擔任。

臺灣學生聯盟與中國同學會進行合併同時，臺灣同鄉會也與東京華僑團體進行合併，並共同組織留日華僑總會。1945年9月，東京地區臺灣人開始籌組臺灣同鄉會，原本有幾股小團體勢力競逐，而後經過整合才由高天成擔任會長的一方取得主導權。同鄉會成立後，立即接收東京車站前大樓內舊臺灣總督府東京事務所，以此事務所為辦事處，展開各項服務工作。當時同鄉會主要的工作是，協助解決在日臺灣人的生活問題，以及進行返鄉問題之交涉聯繫工作。隔年，同鄉會

¹⁷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54-64。謝南光（1902-1969），彰化二林人，原名謝春木，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後投入臺灣政治社會運動，1931年底赴上海，戰爭時期投效國民政府，1946年擔任駐日代表團官員，1949年因支持中共被迫離職，1952年潛赴中國。

幹部也開始討論與華僑團體合併問題。經過多次的交涉後，1946年5月間同鄉會決定併入東京華僑聯合會，隨後辦理選舉，選出會長陳禮桂，副會長高玉樹。實際上，與同學會合併模式相同，東京僑社合併前，全日本華僑總會也積極進行籌組。1946年4月21日，由各地華僑共同合組「中華民國留日華僑總會」舉行成立大會，並進行幹部選舉，結果會長與副會長同樣由前述陳禮桂、高玉樹擔任。¹⁸總會主要幹部也都來自東京地區，東京乃臺灣人聚集地，因此日後華僑總會選舉，臺灣人幹部一向居主導地位。華僑總會成立後決定，各都道府縣的華僑團體統一稱為某地華僑聯合會，例如東京為東京華僑聯合會。此一僑社組織架構，一直維持到1951年間才分裂瓦解。

不論學生團體或華僑團體，戰後不到一年期間在日臺灣人與「老華僑」之組織都完成整合，而且建立中央與地方組織。看起來整合過程順暢，組織架構也能涵蓋全日本。然而，不論是學生或華僑，個人的調適過程必定有所不同，總會與地方分會之連繫或磨合，也要有一段較長的時間。臺灣與中國大陸各省學生之間，不論語言使用與思想觀念上，原本就有不少差異，其言論或行動當然也有不同，這些問題也都反映在學生報上。此外，學生聯盟雖然已經解消，但是清華寮依然存在，臺灣學生聚會場所並未改變。不僅如此，日後清華寮生的聯誼聚會持續，甚至組織「清華寮OB會」，並發行會報，臺灣學生聯盟成員也曾再聚會，同時編輯通訊錄。¹⁹透過這些資料與進一步的口述訪談，不僅能掌握其動向，也可以一窺這群臺灣學生的人際網絡，包括同鄉、同學、兄弟姐妹、姻親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學生間還有小團體的存在。例如，受訪者曾表示，他們經常聚在一起的幾個好朋友，經常自稱為「怪人俱樂部」，由於他們志趣相投又具有行動力，華僑領袖將他們稱為「青年將校」。²⁰自古以來人類社會原本就會形成一些小團體，在日臺灣人社群或留日同學會當然也不例外，這類小圈圈的人際網絡也值得注意。總之，本研究在掌握學生會幹部人際網路的基礎上，希望能更深入解

¹⁸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19-221。

¹⁹ 清華寮OB會編，《清華寮OB會會報：第一期》（東京：該會，2002）。會報由蔡朝斡先生提供，僅發行一期。

²⁰ 蔡朝斡接受訪談表示，怪人俱樂部（怪人クラブ）成員包括：蔡錦聰、蔡慶播、蔡朝斡、吳修竹、林鐵錚、陳焜旺、許雲岑等。所謂「青年將校」的比喻，主要是指他們像日本軍國主義的右翼少壯軍官一樣，不斷採取激進行動，引領學生運動的方向。蔡朝斡，〈蔡朝斡先生手稿文件集〉（未刊稿）。

讀學生報之內容。

除了臺灣學生的人際網絡值得注意之外，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聯結更值得深入探討。但是到目前為止，各種文獻都未見詳細之記載，在此只能根據訪談紀錄並參酌文獻來補充。根據共產黨幹部楊春松（臺灣人）的傳記顯示，他在1945年底曾經從東京經朝鮮半島到達中國華北，與中國共產黨取得直接的聯繫，1946年初再回到東京，此後他成為中共與日共之間的橋樑，並創辦中國通訊社，全力替中共進行宣傳工作。²¹ 楊春松不僅從事共黨宣傳與聯繫工作，也吸收秘密黨員，但這部分傳記中並沒有記載。1947年底楊春松與日共幹部、留學生曾經召開一次秘密集會。聚會地點在東京都世田谷區臺灣人林清文擁有的住宅（接收滿洲國官舍），與會的人員包括：野坂參三、志賀義雄等日共幹部；謝南光、劉明電、劉啟盛、曾永安、邱紹棠等臺灣人；吳修竹、陳焜旺、郭承敏等臺灣留學生；以及于恩洋、韓慶愈、范琦、崔士彥、博仁等中國留學生，會中決定創立共產黨青年學生支部，並積極吸收新黨員。²² 從這份參加聚會的名單來看，除代表團官員謝南光之外，四位臺灣人是東京僑社幹部，學生都是留日同學會幹部，甚至有幾位中國學生先後擔任同學總會主席。換言之，根據訪談紀錄、文獻和史實之查證可知，戰後共產黨的「細胞」不僅進入僑社、學生會，以及各個學校或宿舍等，同時也以地下黨串聯起華僑、臺灣學生與中國學生的聯絡網。

1943年，為配合蘇聯拉攏西方對抗德國的政策，第三國際公開宣布解散，但是各國共產黨還是採取一國一黨的原則。因此，這個共黨組織被納入日本共產黨系統，由日共「民族對策本部」領導，納入該組織的黨員主要是朝鮮人，也包括

²¹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165-169。本書最初日文版：楊國光，《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東京：露滿堂，1999）。楊春松（1899-1962），桃園人，臺灣農民組合幹部，1930年到上海參加左翼青年反帝運動，被捕送回臺灣入監。1938年出獄赴日，戰後在日從事國際共產黨地下組織活動，並創設中國通訊社，1950年前往中國，擔任中共對日與華僑統戰工作。

²² 這段敘述是蔡朝忻手稿之紀錄。吳修竹接受訪談時提出不同看法，他表示：聚會的房舍應該是劉啟盛擔任滿洲國中央銀行東京駐在員的宿舍，此聚會主要目的是臺灣人向日共幹部探詢中共實情，中國學生只是配角；聚會的時間應該是1948年上半年，由於少有臺灣人願意加入共產黨，因此不久之後才有「華僑民主促進會」的誕生。兩人不同之說法，尚待日後查證。有關日共的活動，請參見大森實，《赤旗とGHQ》（東京：講談社，1975），頁171-206。有關臺灣學生參加日本共產黨的經驗，可參見郭承敏，《秋霜五〇年：台灣·東京·北京·沖繩》（那霸：ひるぎ社，1997），頁13-36。這群學生之中，1927年屏東恆春出生，臺南師範學校休學的郭承敏，在其著作中承認自己在1948年間就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時加入日本共產黨。

臺灣人與中國人。這一個特殊的黨組織，到底採取哪些行動，已經很難查明。但是，從日後僑社與學生會逐漸左傾的結果來看，該組織的活動確實發揮某種影響力。以下檢視臺灣學生之人際網絡，分析學生會的活動與學生報內容之同時，也將試著搜尋此一地下組織之活動跡象。

三、留日學生報言論內容之變化

留日同學總會成立後，就已決定發行機關誌，但一直到 1947 年 1 月 31 日才發行創刊號。最初刊名為《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然而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大致是以月刊方式發行。這份學生報以四六版八開 4 頁或 8 頁的篇幅發行，同學總會主席為發行人，另設編輯人。1947 年該刊編輯人由《龍舌蘭》主編李子聰擔任，日文版面有不少隨筆、論文出現，大致保持臺灣學生聯盟機關誌之學生刊物風格；1948 年間編輯人是臺灣學生李泰然、簡鏡山，中文版則是由林連德等中國學生負責；1949 年編輯人是中國學生崔士彥與呂永和，但日文版面應該還是由臺灣學生主導。留日學生報發行間隔不一，多次發行合併號，1949 年 10 月 11 日發行第 36 號，本文以這三年共 36 號的內容為主要討論範圍。

如前所述，三年之間，學生報編務負責人也有輪替。第一年由臺灣學生李子聰主導，第二年由臺灣學生李泰然與福建出身的林連德合力編輯，第三年則換成崔士彥等來自中國大陸之學生負責。學生報大致維持中日文版各半的篇幅，日文版在前，中文版在後，各類文章最初以學生會員撰稿為主，後來轉載文章日漸增加，中文版轉載比例較高。三年間學生報內容，大致可分三個時期來討論，以下將先討論前兩個時期，1949 年以後的內容變化，將留待下節再探討。

（一）1947 年間學生報的風格與特色

學生報在第一階段具有較濃厚的學生刊物之風格，編輯與言論方向大致由臺灣學生主導。由於臺灣留學生對於學術、藝文活動，顯得較為關注，故部分人甚至競相發表專文。學生報第 14 號 1947 年回顧合併號中，刊載中央大學法學部學生陳萼芳討論華僑言論界之專文，文中他針對學生刊物批評說：

到目前為止發行的學生刊物大概有《中華留日學生報》、《橄欖》、《白日旗》、《龍舌蘭》、《星火》、《崑山》、《牡丹》等。這些刊物應該要反應全體會員意見，但實際上卻都只能看到少數編輯人的主張而已，其視野略顯狹隘，論點也過於淺薄。以留日學生報為例，日文的撰稿者以李子聰、李泰然較為重要，華文版以林連德最為積極。今後編輯者應該努力地找出有能這樣寫稿能力的人，讀者也要更積極向主編提供建議。提供建言當然不能過度求全，但也不能太過明哲保身。期望同學諸兄深思努力，個人只能在此提倡從漸進發展以達完美的經驗論之哲學。²³

這段話已清楚突顯學生報具有寫稿能力者不多、讀者人文素養不足的窘境。但更嚴重的問題是，往後還持續出刊的僅有留日學生報，其他小團體之學生刊物，大多難以持續發行。

儘管有這類嚴厲的批評，整體而言，這一年間學生報中部分臺灣學生的文章，還是頗具可讀性，其中陳萼芳文章最具代表性。例如，陳萼芳〈津田左右吉史觀を批判す：シナの史というものを中心として（上）（下）〉（第8、9號第4、7版），文中批判知名學者津田的中國史觀，充分顯示其學術論辯之能力；陳萼芳〈終戦後の華僑文化界（上）（下）〉（第9、10號第7、4版），此文與前文一併閱讀可知，他一貫關注華僑出版文化與言論活動，且留下了最完整的觀察紀錄。此外，李泰然〈近代藝術小論（一）（二）〉（第3、4號第4版）、李泰然〈ギリシヤ彫刻 ヴィーナスの美〉（第6號第4版），概略介紹近代美術發展史，似乎有意藉此提高同學美學素養；還有，李泰然〈基督教の直面せる課題〉（第12號第4版），介紹宗教與哲學相關問題；李振華〈台湾青年の言語問題〉（第8號第4版），主張戰後臺灣人應該恢復臺灣話能力並積極學習中國語，其論點不僅具有主體性思考，也能透徹認清現狀之問題；還有，林鐵錚〈学び方の問題：理科系学生に寄す（一～三）〉（第5、6、7號第4版），綜談理

²³ 引文為日文原文大意，筆者摘錄翻譯而成。陳萼芳，〈華僑言論出版界展望 書ける人の欠乏か 読者層の素養の不足か〉，《中國留日學生報》14，1947年11月30日，第2、4版。陳萼芳從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擔任開業醫師後，再考入東京的中央大學法學部就讀，他的興趣是中國傳統音樂與戲劇。劉智渠述，劉永鑫、陳萼芳記，《花岡事件：日本に俘虜となった中国人の手記》（東京：岩波書店，1995）。

工各領域學習方法；李子聰〈近代思想の流れ：相対立する二つの思潮〉（第11号第4版），簡介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明顯是為提高留學生之人文知識；鄭國演〈中国における新社会政策の課題〉（第12號第4版），說明戰後中國的社會問題與應有之對策。這些文章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知識，或簡介相關思潮，或提出獨創性的論述。例如，李泰然與林鐵錚的文章，都很深入地討論到美學與科學的基本課題。只要稍加瀏覽學生報前述幾期之內容，大概都會快地被這幾篇文章吸引，其內容充分表露臺灣學生的學養。這些具有學術風格的文章，讓這份學生報甚具可讀性。

相對地，「華文欄」的風格則有很大的不同，這一年主要刊載都是隨筆、詩歌或宿舍生活的通訊報導等。雖有部分論說性質文章，但大多是針對五四運動、七七抗戰、八一五勝利紀念等，發表其感言或表述愛國的情懷，學術氣息較為欠缺。不僅如此，有一些專文甚至讓人感受到，作者明顯抱持呼應中共宣傳之意圖。例如，于恩洋〈中日戰爭之史的意義〉（第9號第5版）一文強調：抗日戰爭勝利是無產階級努力的結果，這個徹底反封建勢力反帝國主義的動向，必然影響未來中國與世界發展的趨勢。²⁴ 這是當時中共的論點，經過其表述出來，正足以觀察共黨宣傳的滲透情況。此外，不少文章是轉載上海或香港中文報刊雜誌之文章，其內容與留日學生生活較無關聯。總之，兩相比較之下，「華文欄」內容顯得較為空洞而教條。

留日學生組織化之後，總會之外還有各種地方性或文化團體，團體聚會是資訊交流與思想激盪的場域。對這些團體之活動或各地宿舍生活，學生報也有不少的報導。但這些學生動態報導，由於大部分都是關東地區消息，因此關西地區學生似乎有很多不滿，甚至投書將學生報比喻為「啞巴的喉嚨」（第7號第3版）。當然，編輯部方面還是強調，已經在各地設置聯絡處，希望大家賜稿，並再次表示學生報是全體留日學生的刊物。但是，寫稿者與報導內容以關東地區為主的問題，似乎一直沒有解決。學生會成立之初就強調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學生報除了知性論述或基本教養的文章之外，最常見的是演講會、研究會、運動會、球

²⁴ 于恩洋，〈中日戰爭之史的意義〉，《中國留日學生報》9，1947年8月15日，第5版。根據蔡朝忻與陳焜旺的口述與筆者之查證得知：于恩洋，1923年生，山東省人，父親于學忠（1890-1964）原為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戰後退役，1949年中共建國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戰時來日留學的于恩洋，在學期間思想已左傾，畢業後居留日本成為僑社幹部。

賽、棋賽等藝文或休閒活動報導，少數時事報導或政治議題，大致都能保持平實客觀。

1947年間，學生報主要是關心中國與臺灣之時局，以及華僑權益問題等。1947年2月26日，學生會之「時事問題研究會」舉行第一次講演會，由駐日代表團謝南光主講：「中国憲法について」，第二次是3月1日，代表團委員吳世漢主講：「中国經濟再建の基本条件」，第三次3月16日同樣是謝南光，講題：「中国の自治制度に就いて」，這些演講應該是以日語進行。配合謝南光的演講，中央大學法學部臺灣學生蔡錦聰在學生報以日文發表：「中華民國憲法解說」，分三次刊載於學生報。²⁵ 從演講與專文的搭配可以看出，臺灣學生透過日文積極地想要了解中國政治現況與體制之企圖。但這時二二八事件消息傳來，因此謝南光在16日的演講中特別表示：「這次事件與其說是暴動，不如說是要求改革的政治杯葛。」²⁶ 學生報刊登謝氏演講紀錄同一版面，同時收錄吳修竹與蔡錦聰兩人的文章。吳修竹除了推定這事件是官方的失政之外，並斷定事件絕非臺灣尋求獨立的暴動。同時，他也憂心地表示，政府若未合理地解決問題，臺灣必定成為中國政治的禍根。蔡錦聰評論政治改革之要求時表示，地方自治改革要求不能抵觸憲法，必須對表達對祖國的忠誠，才能重新展開臺灣的民主化與模範臺灣之建設。²⁷ 3月10日學生報第3號發刊當時尚未傳來大屠殺的消息，所以並未對國府的暴行進行較激烈的批判。實際上，根據訪談與回憶錄顯示，隨著鎮壓與屠殺的消息陸續傳來，焦急的臺灣學生幾乎都是連日徹夜地討論相關問題。

相對地，山東出身就讀東京大學的周元賓，也在「會論」欄以中文發表感言，題目：「獻給臺灣省諸同學：關於臺灣二·二八事件」，他在文中表示：

我覺得我們祖國，沒有在偏愛著福建，虐待著臺灣。河北山東難道說比臺灣還幸福嗎？祖國的兒女太多了，照料不周恐怕是件難免的事。回到了祖

²⁵ 蔡錦聰，〈中華民國憲法解說〉，《中國留日學生報》3，1947年3月10日，第1-2版。這篇解說文第二次與第三次分別刊登於學生報之第4-5號。

²⁶ 介紹謝南光談話的原文標題：「暴動ではなく、政治ストだ」。此外，學生報第7號預告，時事問題研究會在7月4日下午邀謝南光在舊滿洲會館講堂演講，題目為「最近の情勢に就いて」。演講內容不得而知，但從演講的頻率，他對臺灣學生的時局認識應有一定的影響。

²⁷ 吳修竹，〈軽々しい断定を許さない 台湾二・二八事件の見方〉、蔡錦聰，〈地方自治の限界〉，《中國留日學生報》3，1947年3月10日，第2版。同一版面也轉載中文之三十二條要求，日文之白崇禧談話。原文為日文，引文翻譯與大意中文摘錄皆為筆者。

國的懷抱，不要只談要求，而是要給與。不要只主張權利，更應該感到責任與義務，不是站在國外說風涼話，而是要混進群裡幹下去。我常覺得我們對祖國可以有兩種看法，第一，我們看祖國為「母親」，我們敬愛她，感謝她，在他的懷裡，我們可以感到了安息。同時，我們也可以看祖國為自己「孩子」，我們應當要愛護她，撫養她，教育她。我們不要學那些列路旁作惡事的小孩而付一笑的人。我們應該深切的感到祖國的前途成長，都是在我們的双肩上。……一時的不安恐懼憂鬱，不要誤了我們百年大計，我們須從矛盾裏得到新的力量而發現一條新的道路。²⁸

周氏的愛國論述在中國留學生裡面應該具有代表性，儘管情感豐富而言詞懇切，但是這樣的觀點與臺灣青年的認知顯然有相當的落差。

二二八事件對個別留學生的衝擊必然有所差異，雙方對國共內戰的看法或許也有不同，但此時這些問題似乎都還未影響學生報的內容。因為，這一年學生報的內容政治色彩並不明顯，政黨支持意向尚未明確表露。最值得注意的是，投稿的臺灣學生都以日文發表自己的學習心得，從內容可知他們積極向學的態度。但是，就如代表團官員徐逸樵的報告：「臺灣學生大抵須有較長期間補習國語之機會，不然實與日本學生無大分別。」²⁹ 語文轉換並絕非短期就能實現。雖然臺灣學生學養俱足，日文能力與日本學生無異，但若未能獲得重視並給予合理安排，必定無法在中國社會發揮其專長。

（二）1948 年間學生報內容的政治偏向

留日學生報內容的轉向，1948 年 5 月 4 日第 18 號應該是重要的指標。這一期名為「五四紀念特輯號」，頁數倍增為 16 頁，發行人王毓聲、編輯人康春祥。

²⁸ 周元賓，〈獻給臺灣省諸同學：關於臺灣二·二八事件〉，《中國留日學生報》4，1947 年 3 月 30 日，第 1 版。

²⁹ 〈外交部王世杰函教育部據駐日代表團徐逸樵來函建議處理留日學生四點辦法〉，收於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一），頁 17-18。徐逸樵（1899-1989）浙江諸暨人，1917 年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24 年返回中國後先後在幾所大學任教，1944 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1946 年任駐日代表團顧問，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辭去駐日代表團職務，潛心研究日本，1978 年回中國定居，在中國被稱為民主人士。周南京主編，《世界華僑華人辭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647。

這期特輯中，日本左翼學者鹽脇幸四郎〈五四運動の歴史的基礎〉專文佔了12頁，其餘4頁中文版也是談五四運動。鹽脇之專文，將五四的發生定位為中國革命史的源頭，然後分別介紹五四對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革命有何影響，最後他強調中共是當前革命運動的中心勢力，並論斷中國即將展開新的五四運動。中文版文稿之論旨，也是將五四學生運動聯結到當下的反帝、反內戰的學生運動。這是學生報相當特殊的一期，整體明顯在呼應中共之宣傳論述，這顯示學生會已開始轉變。接著第19號，編輯人由李泰然、林連德、簡鏡山等三人列名，但是編輯後記說，這是由他們主編的第二期。³⁰ 從會長更替與內容變化來看，三人應該從第18期已負責編輯。這一期頁數恢復為8頁，編輯體裁也恢復創刊以來的樣貌，但後半中文部分則改成「中國留日學生報國語版」，並開始轉載各類中文稿。

第19號的第4、5版是跨頁之特集，其中第一篇文章為李泰然〈中国文学界の最新の動向〉，此篇名可視為特集的主題。李泰然是主編。他又在同一版面發表〈魯迅と二葉亭〉一文。兩頁的特集之中，還刊載：甘文芳³¹〈五・四運動以来の實際と理念の発展〉、波多野太郎〈中国最新の文芸作品：新桃花扇〉、鹿地亘〈人間的自由の追及と戦後の日本文学〉等。另外，還有一幅跨頁木刻版畫，下面選錄老舍的一段話。整體來說，這次特集就是邀請日本左翼文化人共同介紹中國左翼文學之發展。其中，鹿地亘介紹自己的民主主義文學理念，他的文章從第16號就已出現，往後還一再刊登他的文稿。鹿地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領導人，也是知名的普羅文學家，他頻繁出現可視為學生報左傾表徵之一。³² 第19號編輯後記強調：我們的方針是，新聞性可以較為減低，但我的理念與主張必須貫徹。既然是留學生的報刊，就要有學生報的發展方向，我們既非追求新聞性的學生報，那就必須比普通報刊更具批判性。³³

³⁰ 1947年間同學總會主席范琦，1948年初改選後新任總會主席王毓聲，康春祥是文化部負責人，因此掛名主編。實際負責編輯的是李泰然、林連德等人。李泰然為臺灣知名資產家李延禧之長男，學習院大學畢業，他有兩個弟弟李恭然、李惠然，1950年代父子4人連同其家族一同前往中國。

³¹ 甘文芳（1901-1986），彰化人，1926年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41年取得醫學博士，戰後成為華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運動之領導人，1954年擔任第2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1959-1982年間擔任東京華僑總會會長。請參見可兒弘明、斯波信義、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東京：弘文堂，2002），頁172；周南京主編，《世界華僑華人辭典》，頁161。

³² 有關鹿地亘（1903-1982）戰時與戰後初期的行蹤與思想，請參見大森實，〈鹿地亘（作家）流浪の祖国革命家〉，收於大森實，《赤旗とGHQ》，頁295-319。

³³ 〈編輯後記〉，《中國留日學生報》19，1948年6月15日，第5版。原文為日文，筆者摘要翻譯。

這段編輯方針等於宣布，該報不僅關心時局而已，對於時局發展會有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評論。瀏覽這一年份第 16~24 號的第 4、5 版的特集內容可以發現，正如編輯後記所言，學生報編輯群計劃性地全面介紹中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工業技術、學生動向、木刻版畫、文學等。在第 1 版或第 3、4 版則刊載時事消息與評論，特別是中國各地的學生運動、國際學生運動與國際局勢等。例如，1948 年 6 月 15 日發行的學生報第 19 期與下一期，刊載李子聰整理的「国内新聞各紙最新の論調（上）（下）」一文，他將當前之時局分為：「兩個世界」之問題、日本打破封建性之改革問題、建設民主中國之胎動等三個主題，然後分別進行分析介紹。有關建設民主中國問題佔一半篇幅，且內容再細分為借款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經濟復興問題等三點，詳加介紹討論，文中極力稱讚中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政策。這樣的歸納整理，想必有助於強化留學生的左傾思想。

1948 年 7 月 1 日學生報發行第 20 號，這期同樣積極介紹中國，其特集中專文包括，小野三郎〈陶行知の思い出〉，介紹回顧教育家陶行知之生平事蹟；增田米治〈中国の学生運動と日本の学生運動〉；菊地三郎〈日本民主化を推進〉，戰後創設中日文化研究所並擔任所長的菊地主張，必須引進充分表現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木刻畫到日本，才能促進日本的民主化。藉由日本左翼文化人之推介，往後各期持續刊載中國之左翼新文學與木刻版畫。³⁴ 8 月 1 日發行的第 21 號刊載：宮武謹一〈国民政府下の經濟動向〉、尾崎庄太郎〈中共解放地区經濟の動向〉、赤津益造〈香港の特質と繁栄の意味〉；9 月 1 日第 22 號則刊載：島田政雄〈中国における科学技術と民族工業〉等文章。以上文章之撰稿者都是日本左翼人士，其內容都是介紹與宣傳中共之發展和現況。

接著，10 月 1 日第 23 號是「雙十節第三十七週年紀念」，第 1 版刊載中國研究所理事岩村三千夫〈武昌起義の繼承者〉一文，他在文中表示，武昌起義以來的中國革命的目標就是為了達成民族獨立，為此首先必須展開土地改革徹底掃除封建勢力，今後唯有讓農民解放得以自主發展，才能達成民族獨立之目標。這樣的論述，何者是革命的繼承者，早已呼之欲出。第 23 號有「魯迅先生逝世十二週年紀念特集」，日文版刊載鹿地亘、內山完造、竹內好、島田正雄發表的追

³⁴ 《中國留日學生報》20，1948 年 7 月 1 日，第 4-5 版。學生報上出現大量木刻版畫作品，可能與知名木刻版畫家李平凡正好停留日本有關。

思文；「國語版」則轉載 1945、1946 年魯迅逝世九、十週年分別在重慶與上海舉辦紀念會時的來賓發言，其中包括胡風、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左翼文壇知名人士。透過中日兩國左翼文化人言論，可以看出學生報已日益左傾，最初都是以文化論述為主，但隨著時局的進展，政治論述也逐漸地浮現。

日本左翼人士擁護中國共產革命，同時也批評日本保守政壇為反動勢力，主張推動日本人民民主革命。學生報除了介紹這些人的言論之外，「國語版」也轉載一些上海報刊之文章，這些文章直接批評日本企圖藉由經濟重建進行再武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純青〈論反扶日〉一文，他在文中表示：

日本復興包括無數軍事工業，其目的並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幫美國打共產。主要是復興軍事工業，並不是復興和平生產。（略）日本經濟復興並不是日本「自給」或是日本人民過好日子，對美國是有益的，對東亞卻有大害。復興的主要目標，是備戰，是戰爭。政治問題一字不談，這已經十足是復興軍國主義了。³⁵

這篇文章轉載自上海《觀察》雜誌第 4 卷第 6 期。在此之前，學生報也轉載胡適〈國際形勢裡的兩個問題〉，該文同樣刊登於《觀察》雜誌，另外也轉載《大公報》社評〈反美情緒的分析〉。學生報第 21 號的編後感言中，編輯者表示：「周刊雜誌《觀察》在國內最受歡迎，以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為四個基本原則。本期特以大量篇幅轉載介紹。」³⁶ 不僅這幾期，學生報向來就轉載不少這類報刊文章。根據學者分析，原本立場還算中立的《大公報》與《觀察》等報刊，1947 年起言論就已轉向，隨時局的演變，批判國民黨政府支持中共的傾向日益明顯。³⁷ 根據學生運動研究者分析顯示，中共從 1948 年初起在各主要都市發動「反對美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運動，這項以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為前鋒的「反美扶日」運動，被稱為「國民黨統治區中最後的一次全國性群眾運動」。³⁸ 換言之，透過學生報的轉載，中共的反美帝扶持日本與反國民黨政府的論述，也影響到留日學生。

³⁵ 李純青，〈反扶日論〉，《中國留日學生報》21，1948 年 8 月 1 日，第 7 版。

³⁶ 〈編後〉，《中國留日學生報》21，1948 年 8 月 1 日，第 7 版。

³⁷ 有關《大公報》、《觀察》的轉向，請參見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的變動（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5），頁 223-239。

³⁸ 施惠群，《中國學生運動史（194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 186-208。

在此期間，留學生也積極舉辦時局相關座談會，試圖掌握當前知識分子關心的議題。例如，1948年4月同學會就邀請日本與朝鮮之學生，共同組成「東京在日學生懇談會」，開始舉辦一系列之座談會。第一場邀請岩村三千夫，談論各國之學生運動；第二場邀請中國研究所所長平野義太郎，談論和平問題；6月20日第三場邀請法學者戒能通孝，共同討論天皇制問題；7月4日第四場邀請鹿地亘，談論朝鮮人教育問題。³⁹ 從邀請活躍於第一線的文化人，建立跨國界的學生網絡，談論大家最關心的敏感問題，可見留日學生對時局有其自主性，並非被動地閱聽，而是主動地探究。若將焦點鎖定臺灣學生，我們可發現他們還持續以日文發表藝文類或學術性的文章。例如，李恭然〈笑ひの為に〉（第19號第2版）；簡鏡山〈音に関して（上）（下）〉（第19、20號第2版）；黃八愷〈科学の進歩・大戦と現実感の回復〉（第20號第2版）；李恭然〈中国人の生活と現実性の解釈〉（第22號第3版）等。這些都是發揮個人所學專長的論述分析，相當具有可讀性，可惜隨著時局的緊迫，這類稿件日漸減少，終至消失。整體而言，1948年學生報內容隨者時局的演變，逐漸把焦點鎖定在中國的時局變化。有關美國在經濟上採取扶植日本政策之批判，往後進一步擴展為反美帝之論述。

四、在日臺灣人與學生報言論之左傾化

時序進入1949年，蔣介石下野，國民黨在內戰中一再挫敗，共產黨已擁有明顯優勢。翻開1949年《中國留日學生報》第25號，言論已一面倒地表明支持「新中國」。例如，第一版以「新中国と我々の任務」為題，刊登同年1月23日舉辦的「華僑留學生座談會」會議紀錄，座談會出席者：華僑代表甘文芳、林清文、劉啟盛；學生會前輩博定、吳修竹、陳萼芳、蔡錦聰（以上除博定之外，皆為臺灣人）。學生周元賓、王兆元、韓慶愈、李桂山、林連德（以上6名為中國學生）、林傑榮、高銘智、曾紹德、郭承敏、鄭江明（以上5名為臺灣學生）等，學生報主編崔士彥擔任司儀。會中最重要的結論是儘快召開僑民與學生大會，表明支持新政府。⁴⁰ 這群人的集結同時也清楚顯示，華僑與留學生已組成親共的聯合陣線。

³⁹ 〈天皇制をめぐる〉，《中國留日學生報》20，1948年7月1日，第1版。

⁴⁰ 〈新中国と我々の任務〉，《中國留日學生報》25，1949年2月1日，第1版。

（一）支持「新中國」之聯合陣線

留日同學總會在 1948 年 11 月 14 日進行改選，學生報中文版編輯的林連德獲選為總會主席，學生報繼任的主編為崔士彥，其他幹部也經過改組，12 月 1 日正式就任。從往後的活動與學生報內容看來，新任幹部對於學生會政治動向有明顯的影響。但是，華僑與留學生建立親共的聯合陣線，更重要的轉變應該是 1948 年 10 月 16 日「華僑民主促進會（以下簡稱「民促」）」、17 日「民主中國研究會（以下簡稱「民中研」）」的接續成立。兩會都在同學總會之會議室舉行成立大會，晚一天成立的民中研全員宣布加入促進會，民促之事務所設於楊春松經營的「中國通訊社」，而民中研之事務所則設於同學會內。⁴¹ 往後，民促與民中研一直採取聯合行動，最常見的情況則是，再加上留日同學總會、留日東京同學會聯名進行，透過這四個團體的結合，讓僑界與學生團體出現一股左傾的風潮。

民主促進會的第一任委員長為劉明電，因對人事與活動方式不滿而辭職，隔年由甘文芳接任。該會之主要綱領：揭櫫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等三反原則，支持祖國解放戰爭，強化與祖國的聯繫，促進華僑團體的民主化，致力解決華僑經濟困難等。民促成立後，積極展開宣傳並呼籲僑胞組成地方分會，因此隨後各地華僑也組成相呼應的團體。⁴² 民促的初期幹部名單不明確，到 1949 年 7 月 10 日，選出 15 名中央委員如下：曾森茂、甘文芳、蔡錦聰、呂漱石、蔡慶播、曾永安、陳焜旺、康鳴球、劉啟盛、蕭錦昌、于恩洋、博仁、劉永鑫、邱紹棠、李鐵夫，隨後選出委員長甘文芳，另外推動創會出力最多的楊春松與首任委員長劉明電被聘為顧問。⁴³ 中央委員之中，僅于恩洋、博仁、劉永鑫三人為中國大陸出身，其中曾永安、李鐵夫是楊春松經營的通訊社員工，這三人與邱紹棠都是戰後不久成立的「客家公會」⁴⁴ 發起人，上述中央委員中曾森茂也是臺灣客

⁴¹ 〈同學總會東京同學會委員改選〉，《中國留日學生報》24，1948 年 12 月 1 日，第 3 版。

⁴²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269-273。民促綱領原文日文，筆者摘要翻譯。

⁴³ 《華僑民報》2，1949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270。

⁴⁴ 客家公會發起人：余家麟、范子唐、賴貴富、賴正山、曾永安、李鐵夫、邱紹棠、楊春松、林鼎乾、陳萼芳。1955 年以後該會停止活動一段時間，1963 年起改為「東京崇正公會」，延續至今。曾永安之弟為前總統府資政曾永賢。請參見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

籍人士。為何民促的客家籍委員特別多？這是值得繼續探討的現象。整理上述團體與人脈可知，共產黨幹部楊春松經營中國通訊社，其主要員工都是客家同鄉，他積極推動華僑成立民促為中共外圍團體，並以通訊社為會址，而民中研則是與民促同宗旨之學生團體。從這些人脈與團體間連結來看，楊春松是催化僑社與留學生左傾風潮的關鍵人物，日後宣傳或組織性活動之開展，這群在日臺灣人一直居於領導地位。

1949年2月1日學生報第25號刊載一篇報導，詳細介紹民中研的理念，並號召學生們大家一起入會。文中強調，在祖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浪潮之中，大家不僅要吸收理論，還要化為實際行動。同時也說明，民中研自成立以來，每週六下午舉辦研究討論會，十幾次的聚會主要是研讀「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史觀」等。⁴⁵ 這期學生報還刊載「我所理想的新中國」投稿活動之結果，這個活動是由每個學生以大約數百字短文，說出自己對「人民的新中國」的期待。結果日文8篇中文14篇，大致上中國學生都用中文，臺灣學生則以日文書寫。同期還用二個版面，大篇幅地介紹1948年中國學生運動全貌，標題中就強調：「解放近了，緊密團結，我們往勝利前進。」概說中強調：1948年的中國學生運動是以「反飢餓、反迫害」運動與「反美反扶日」運動為中心而展開。後續幾號學生報頭版，都是談學生運動。第26號介紹1949年3月1日在解放後的北平所召開的「中國全國學生代表大會」，第27號介紹即將在4月10日召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這一連串的報導，無非是不斷地強調，青年學生的行動與人民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緊密的聯結關係。參照目前的研究論著可知，當時留日學生報的論述，幾乎完全呼應中共主導的學運團體之號召。⁴⁶ 其影響雖難以評估，但政治傾向已相當明顯。

留日學生與支持中共最具代表性的活動，應該是1949年5月4日下午在早稻田大學舉行的「五四運動卅周年紀念大會」，這次大會由「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中國研究全日本學生連合會」與「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合辦。大會一開始由兩方學生代表致詞，接著中國研究所所長平野義太郎演講，題目為「毛澤東の思想」。而後，甘文芳以華僑總會副會長身分主講「中國革命の現階段」。

⁴⁵ 〈正しい認識に基づく実践 民中研の動き活発〉，《中國留日學生報》25，1949年2月1日，第3版。

⁴⁶ 翟作君、蔣志彥，《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362-364。

其次，日本共產黨參議院議員中西功主講「五四と中國學生」，最後壓軸的專題演講者是中國文學研究者實藤惠秀，講題為「五四と文學者たち」。當晚，在兩國學生歌唱表演的營火晚會中結束。這次的演講內容，政治發展方面強調毛澤東的人民民主主義革命即將獲得勝利；文學發展方面強調，文學要向大眾學習，為人民服務。此外，演講者也強調，日本學生必須學習中國學生運動，中日青年學生要團結合作。其主要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建設新中國。」⁴⁷上述學生運動口號，與民主促進會「三反主義」基本上理念互通，這些都是左傾風潮中不斷被提起的宣傳用語。

（二）「進步」分子的「三反主義」

1949年7月11日，民促創辦《華僑民報》之機關誌，該刊為八開本之旬刊，發行至10月11日第8號停刊，除了第8號增為4頁，其餘都是2頁，這是一份典型為中共宣傳的刊物。因此，只要將《華僑民報》與學生報之內容進行比較，即可看出這一年日本留學生與僑界已形成一股左傾風潮，「三反主義」論述不斷地出現是主要特徵。還有，強調支持中共者是「進步」分子，也是一項特色。例如，《華僑民報》第7號中有一篇投書，對民促提出建言表示：

新政府成立後，華僑要怎麼辦？這是今日華僑最切實的問題。除了一部分進步分子之外，大多數人對往後的變化都不斷在猜測，有時感到不安，有時抱持疑惑。最明顯的例子是，東京華僑聯合會會長林以文，在某個場合以僑民代表公然地說：新政府來了，在日華僑處境恐怕會比現在更糟。這樣的看法有何根據暫且不論，問題在於可能有不少人抱持這種想法。因此，在此呼籲民促必須加強其政治性與宣傳性活動。⁴⁸

這篇投書中，間接說明民促就是所謂「進步」的團體，其任務就是為中共在日本進行宣傳與動員。

⁴⁷ 〈中日學生五四運動卅周年紀念大會〉，《中國留日學生報》29/30，1949年5月15日，第1版。

⁴⁸ 新宿Y生，〈ポスト 民促の活動に一言〉，《華僑民報》7，1949年9月21日，第2版。原文日文，筆者翻譯。

民促這個「進步」的華僑團體，其核心幹部都是在日臺灣人，但他們之間關係並非融洽。幾位領導幹部人際關係上的摩擦，可以從當時學生報上對劉明電的人物評論中看出來。這篇文章的開頭即強調：

民促是捍衛僑界利益的前衛性團體，不論碰到任何事情，都會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所謂「三反主義」為口號，勇敢而積極行動，因此不論內外一直都被視為僑界「進步」的象徵，相對地也遭到不少毀譽褒貶。綜合巷間意見，這是因為被稱為民促「三傑」的劉明電、康鳴球、甘文芳等三人，在許多場合都表現出強烈個人性格，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⁴⁹

而後內文中對於劉氏經歷有概略介紹，也對他的大少爺脾氣有所批判。對於這篇文章，下一期讀者投書欄中出現為劉氏辯護的讀者投書，投書者大力肯定他在臺灣與來日後的貢獻，批評前述短文不夠公允。⁵⁰ 有關劉氏的個人評價不擬詳加討論，在此值得關注的是，民促三位領導人同樣是在日臺灣人，但因都有獨特個性，根本難以共事。從口述訪談得知，緩和領導人對立問題，讓會務與活動可以持續運作，前述「怪人俱樂部」的成員扮演重要角色，而客籍的曾永安與邱紹棠則承擔大部分庶務工作。這群左翼臺灣青年的集結，才讓民促得以鼓動左傾風潮，並非前述「三傑」領導之結果。總言之，在各種支持新中國的活動中，在日臺灣人掌握的民促是核心團體，而學生團體則與其密切結合，他們共同的口號是「三反主義」。

有關所謂「三反主義」之路線，以及強調「進步」分子或團體之說法，目前應該如何評斷呢？不以意識型態對立問題來談，僅從新聞宣傳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成功的宣傳策略。所謂「進步」是屬左翼文化人自我定位的宣傳，成功地將他者貶為「反動」分子，這種說法一直是日本新聞界的主流用語，其影響相當深遠。從以上學生報的言論分析可知，這群知識分子的共同理念是：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及其扶植日本反動派，反對傳統封建體制與農民剝削體制，反對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期盼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樣的理念以三反主義之口號表述，在當時確實具有強力的宣傳效果，激發了許多青年學生投入他們領導的

⁴⁹ G, 〈人物評論 大きなお坊ちゃん 民促と劉明電〉，《中國留日學生報》33，1949年7月1日，第3版。原文日文，筆者翻譯。所謂三傑，原文為「三羽鳥」。

⁵⁰ 義人，〈声 甚だ心外に堪えない〉，《中國留日學生報》34，1949年8月15日，第2版。

政治運動。從結果來看，這是中共的宣傳策略成功，爭取到大部分日本僑民與學生的支持。當然，以今日的情境來看，自封為「進步」分子或許已成歷史的反諷，因為當時這種排他性的強勢宣傳，似乎也埋下共產黨掌權後走向獨裁專制道路的種子。

（三）「此仇不報枉為人」的憤怒

戰後在日臺灣人為何能主導日本華僑的左傾風潮，這應該與當時臺灣人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關。此外，出現這種情勢還有一項重要因素，那就是臺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反彈。不僅是臺灣學生與僑民，戰爭期來日的中國留學生，也有其排斥國民政府之原因。因為，國府視他們為「偽政權」所屬的「偽學生」，懷疑他們的忠誠度。因此，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留日學生，一直過著惶惑不安的日子。

1947年7月15日發行的學生報第7號，被稱為「七·七復興紀念號」，這一期刊載了7月7日當天東京同學會在紀念大會上通過的〈學生大會決議文〉，其中一段內文如下：

我等為尚滯留日本之學生，會員之所聚，有來自國內，有現地之華僑及新生臺省同學，凡皆經歷戰爭，飽嚙鐵蹄飢寒之苦，而維繫於探求真理之心，以備貢獻於祖國者。抗戰初期，我等本應隨大軍西去，共赴國難，或束裝歸里，救民族於垂亡。然求知至上，庶成一知己知彼者，抑有所作益於抗戰工作。戰勝光臨，得以目睹此歷史轉變之悲喜劇，除對祖國人民深表謝忱，衷心有所愧然。⁵¹

文末的「愧然」，大致表露這批留日學生的心境。這類由同學會署名以表達「惶恐」「羞愧」心境的〈陳情文〉，也出現在1946年間教育部的檔案附件。⁵² 因為，戰爭期還留在日本的留學生，大多是汪精衛政權或滿洲國派遣的留學生，他們擔心遭到責罰。臺灣學生赴日的情況不同，大概很難體悟這批中國學生的不安。相對地，中國學生也較難理解臺灣學生對二二八的悲憤情緒。

⁵¹ 〈學生大會決議文〉，《中國留日學生報》7，1947年7月15日，第1版。

⁵² 請參見〈附件：中華民國留日同學總會呈教育部呈〉、〈附件：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呈教育部報告〉，皆收於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一），頁2-4、15-16。

中國留日學生的不安，來自於擔心國府不承認其學歷，甚至被認定為漢奸。根據林清芬的分析，戰後國府教育部擬定「抗戰期間留日學生甄選辦法」，1947年開始舉辦留日學生的資格甄選。這些學生被迫要寫自傳，研讀圈點《國父遺教》與《中國之命運》後，還要交讀書報告。這樣的甄選方式，直到國府遷臺後的1952年間還在進行。⁵³ 已經返國的留日學生，或許不得不接受甄選，較有志氣的學生，可能一開始就拒絕認同國府。檢視中國出身的學生會幹部年齡與學歷可知，他們都是大學畢業後赴日，特別是汪精衛政府派遣的留學生，年紀較長且有自主想法，來日後多少也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潮洗禮。他們原本就很難接受戰後國府的處置，滯日不歸也是觀望或表明心志的一種方式，等到國府在內戰中敗象顯露，這批學生當然倒戈相向。國府處理戰時留日學生之辦法，在此明顯地種下了敗筆。

臺灣學生唾棄國府的主因，主要是二二八事件的衝擊。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日臺灣人很快就發出強烈的批判聲浪，從臺灣逃到日本的人到學生團體與僑社報告所見所聞，他們所言比報紙報導更具感染力。⁵⁴ 在這樣的氣氛下，當然沒有人對國民黨政府抱持好感，青年學生的聚會中更是群情激憤。而中共也趁這個機會，藉由左傾的在日臺灣人與其主導之僑社，積極展開「反蔣」、「反內戰」之宣傳。⁵⁵ 1948年8月24日，日本一些主要英日文報紙都報導了臺灣獨立運動之消息，引起各界的注意，包括左傾的僑社與學生刊物，也一致認定臺獨主張是國際陰謀，並暗指其背後就是美國。例如，同年9月1日學生報第22號刊載了一篇「發掘臺灣獨立地下結社的真相」的分析專文，標題前直接寫著：「誰的陰謀？」然後在內文質疑這些地下組織到底是哪一國人所為？這樣的宣傳一定是帝國主義的陰謀。⁵⁶ 同一期中文版面也轉載8月24日《大公報》臺北專電，標題：〈臺灣議長黃朝琴力闢獨立運動謠傳〉，並說明對魏道明主席也認為是另一種陰謀。有關臺灣獨立主張的出現，此時國共兩黨難得有部分共識，實際上是有很大的差異。

⁵³ 林清芬，〈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頁109-122。

⁵⁴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61-265。

⁵⁵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頁173-177。

⁵⁶ 〈台灣獨立地下結社の真相を衝く〉，《中國留日學生報》22，1948年9月1日，第3版。標題上方以明顯的反白字體寫著：「誰の策謀か皮肉か」。同時期，神戶方面的華僑刊物也是同樣的論調。請參見：義方，〈臺灣獨立運動的錯誤〉，《華僑文化》10（1949年9月21日），第1-2版。

1948年10月1日，學生報第23號中文版刊載楊春松〈光復後的臺灣〉一文，他除了批判陳儀之惡政與二二八的大屠殺，針對臺獨主張的出現，他評論說：

最近美聯社所報，臺灣分離運動的消息，追本溯源，可說是二·二八慘案所帶來的產物。但是，分離派的主張，不能說是解決臺灣問題的真正辦法，它們的國際背景，它們暗藏著的企圖，都值得人民警惕。在目前臺灣的腐敗政治之有利條件下，分離派或可以欺騙和吸引到一些近視的、自私的和不顧民族利益的人們的贊同。但是，進步的有良識的人士，卻表示著敬遠，或堅決地反對。⁵⁷

文章最後向青年學生呼籲，必須反對分離主義之主張。這樣的論調，對於留學生界應該有一定的影響力。1949年2月1日發行的學生報25號，在「祖國短信」欄中，刊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呼應毛澤東提出和談八條件的聲明，聲明文批判國民黨在臺的暴政之後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依然在推動其遠東侵略計畫，積極準備完成對臺灣政治與經濟的掌控。如今，反動分子子顯露其凶惡的本性，意圖要保存反動的支配結構，堅持走向反革命方向。我們為了實現全國解放，獲得真正的和平，一定要讓瀕死的反動分子接受八條件與無條件投降，否則就要徹底戰鬥到最後。⁵⁸ 文中的反動分子是指蔣介石集團，往後每年2月28日當天或之前，親共僑社都會舉辦紀念活動，活動中的宣傳都是將此事件被定位為「反蔣」的「起義」，談二二八同時也要批判臺灣獨立運動，然後展開一貫的「反蔣」與「反美帝」之宣傳。

1949年2月1日學生報第25號刊頭左側，出現一則「臺灣二·二八事件紀念大會」之通知。這次集會在3月15日下一期學生報有詳細報導，大會由前述民促、民中研合辦，留日東京同學會協辦，日本共產黨與朝鮮人聯盟都派代表致詞。大會中經參加者提議表決通過，將元兇陳儀列為「戰犯」，並要求懲處屠殺臺灣人民之軍警特務人員，並以大會名義致電毛澤東主席。配合這則活動報導，跨頁的版面還刊出專文，說明二二八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定位，並介紹謝

⁵⁷ 楊春松，〈光復後的臺灣〉，《中國留日學生報》23，1948年10月1日，第8版。

⁵⁸ 〈祖國短信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和談について声明〉，《中國留日學生報》25，1949年2月1日，第5版。原文為日文，筆者翻譯。

雪紅的事蹟。另外，還轉載一篇標題為〈新民主台湾の構想〉的《文匯報》專欄報導，附上謝雪紅照片，介紹其前往華北解放區準備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與準備在會上發表的「關於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書」。⁵⁹ 以上報導都是偏向中共立場的消息，留日學生接受這些時局報導，對臺灣前途的看法當然會被誘導。

在上述二二八事件紀念大會召開同時，署名林木順的《臺灣二月革命》專書也由民中研發行。這是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日文著作，真正的作者應該是臺共幹部楊克煌，全書說明二二八事件之前因後果，強烈批判陳儀政府統治與國府武力鎮壓。此種觀點的書籍流傳，對於國府統治的不信任感當然更加強化。1949年5月15日學生報第29、30合併號刊載一則〈臺北四·六學生彈壓事件〉，主標題是「白色的風暴吹向臺灣」。全文報導4月6日數百名臺灣大學與省立師範學院學生遭到逮捕的經過。報導中強調：南京「四·一慘案」中許多勞工與革命知識分子遭到殺害，犧牲者的血尚未乾，竟然又對臺灣的學生展開鎮壓。許多臺灣的青年學生知道四一慘案後，認為對這件事保持沉默是可恥的，原有計畫採取聲援的行動，沒想到在陳誠的指揮下特務竟然已先下手。這則報導標題前有一幅伸出拳頭憤怒青年的插畫，下方寫著：「此仇不報枉為人」。⁶⁰ 這是編者表達憤怒的方式，這樣的訴求無非想引起青年學生的共鳴。特別是對臺灣學生而言，從二二八事件到四六事件，可說是新仇舊恨糾結，要報此仇一定要推翻國民黨在臺的暴政。如此，不論各省籍之留學生是否支持中共，至少「反國民黨」可以成為一項共識。

五、留日同學會支持中共政權之演變過程

1949年以後，東京地區以民促為中心的在日臺灣人，其支持中共的言論與行動已經相當明顯。而學生會也早與民促結合起來，不論是學生報內容，或紀念二

⁵⁹ 郭梅鄉，〈革命完成最後の舞台 赤い星謝雪紅女史解放区へ〉、〈陳儀を戦犯へ 倒れし先烈に続け 台湾二・二八事件記念大会〉，《中國留日學生報》26，1949年3月15日，第2-3版。國民黨常以「漢奸」為罪名加諸反對派人士，相對地，左傾分子則經常給予國民黨高官「戰犯」之罪名。

⁶⁰ 〈白き嵐台湾を吹く 台北四・六学生弾压事件〉，《中國留日學生報》29/30，1949年5月15日，第2版。

二八事件與五四運動等活動，明顯都在呼應中共的宣傳論述。國民黨政府有駐日代表團可以運用，為何無法爭取華僑與青年的支持？在喪失僑民與學生支持後，國府或代表團又採取何種措施拉攏學生呢？這是一場國共內戰延伸的海外僑民與學生的爭奪戰，其中不僅涉及國府僑務政策之失敗，同時也牽涉到留日同學會的動向與為何選擇支持中共等問題。

（一）留日同學會與左翼學生運動之聯結

正如前述，學生報相當關心中國大陸青年學生反內戰等風潮，不斷批判國府的鎮壓行動。與此同時，留日學生與在日國際學生也形成結盟，強化了其反國府之論述。戰後，日本左翼學生運動興起，同時逐漸發展出在日國際學生組織，中國留日同學會很快就與其合流，並參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學生活動。

從學生報活動報導之內容可知，戰後在日學生的跨國活動相當頻繁，而且都明顯具左翼運動之傾向。第8號學生報頭版刊載，1947年7月6日「中日親睦會」與「朝鮮學生同盟」曾在東京合辦中、鮮、日青年學生的聚會，發表談話的主要來賓為實藤惠秀、中西功、平野義太郎等。⁶¹ 第9號學生報刊載，7月9日舉行一場由「日本學生同盟」主辦的中、鮮、日學生座談會。同一個版面還報導，6月20日京都方面學生成立「國際學生友好會（ISGS）」，中華民國京都留日同學會梁景福、葉守中代表參加創立大會。該會除中、鮮、日學生之外，還有印尼的學生也來參與。學生報同時也介紹，8月1日在東京的印尼學生召開了「印尼學生獨立聯盟緊急大會」。⁶² 由此可知，此時在日各國學生正在尋求國際性的結盟。

1948年國際學生的聯合聚會，除了聲援印尼獨立運動，主要就是關注朝鮮人教育問題，1948年6月15日學生報第19號刊載一篇社評，批判日本政府打壓朝鮮人學校之政策，聲援朝鮮人擁有自主教育的權益。⁶³ 此外，透過在日國際學生懇談會的召開，籌設「アジア學生聯盟」的提案也獲得通過。8月16日，由各國人士與學生團體共同主辦「アジア平和文化祭」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舉行。這項

⁶¹ 〈中、鮮、日学生青年の集ひ〉，《中國留日學生報》8，1947年7月15日，第1版。

⁶² 〈國際的親善の芽生え 國際学生友好会の發足〉，《中國留日學生報》9，1947年8月15日，第2版。

⁶³ 〈社評 朝鮮人学校問題の焦点をつく〉，《中國留日學生報》19，1948年6月15日，第1版。

活動的宗旨是：反對日本的再武裝政策，維護亞細亞民族的獨立與和平。參加這項活動的國際人士除了鮮、日、中之外，還有印尼、印度、菲律賓的代表出席，華僑總會會長黃廷富代表致詞，前同學總會主席范琦也以出席者起來發言。接著，9月間在同一會場又舉行「第二回國際青年日」的大會，該會宗旨是「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戰爭」。報導中強調，大家要共同監督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改革之落實，以維繫世界民主主義勢力的潮流，阻止任何法西斯勢力重現。⁶⁴

前述留日學生反帝反法西斯之理念，與當時親蘇反美的左翼「國際學生聯盟（另譯：國際學生聯合會）」（IUS=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之運動方針，明顯相互呼應。該國際學生組織總部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戰前是以反納粹為基礎而形成的青年學生組織，戰後再集結，並於1946年8月召開代表大會，1950年代分裂以前，執行部受到共產主義者控制。⁶⁵ 根據上海出版《中國學生運動史》之記載：1946年8月國際學聯在布拉格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國民黨政府曾指派一批在英國留學生，自稱「中國中央學聯」代表，冒名參加代表大會，甚至當選理事會副主席。而後，由中共主導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努力衝破國民黨政府封鎖，並與「進步的」青年學生團體聯繫，才得以在1947年8月參加第二次理事會。研究者強調：會中全國學聯揭穿前一年國民黨政府花錢雇用三青團員冒名參加大會之事，並由理事會通過抗議中國政府壓迫學生之決議文。1948年2月，國際學聯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東南亞青年和學生大會，討論交換殖民地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學聯也前往參加，透過這次交流「更堅定了勝利的信念」。⁶⁶ 以上敘述雖為共產黨本位觀點，實際可能要打些折扣，但由此可知左翼之國際學聯與中國學聯已經建立結盟關係。了解國共兩黨在國際學聯中鬥爭結果，留日學生會與反國民黨學運之聯結關係，也就顯而易見了。

⁶⁴ 〈アジア民族平和文化祭〉，《中國留日學生報》22，1948年9月1日，第1版。文中刊出「平和文化祭」口號：「中國要統一、亞洲要解放、世界要和平」。而後，「アジア學生聯盟」改為「在日國際學生協議會」，主要成員為中、日、韓學生，有些活動也有印尼、菲律賓或印度等學生參加。

⁶⁵ P. G. アルトバック (Philip G. Altbach) 著、喜多村和之訳，《政治の中の学生：国際比較の視点から》（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頁243-262。從本書可知，有關IUS=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日文譯為「國際學生聯盟」，中文譯為「國際學生聯合會」，學生報採日譯漢字表記。

⁶⁶ 翟作君、蔣志彥，《中國學生運動史》，頁362-364。

根據留日學生報之報導，1948年底，「國際學生聯盟」與「世界民主青年同盟」與共同舉辦紀念活動，兩團體以11月1日為「世界青年日」、14日為「世界學生日」為由，制定11月10-17日為「國際學生週」，活動期間主要的口號如下：第一，確立世界永久和平；第二，軍備縮小、禁止使用原子彈；第三，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希臘及其他所有殖民地國家的侵略；第四，增加教育費、縮減軍費；第五，科學要服務人民、要帶來和平。有關中國部分，報導中特別強調：中國學生會繼續進行英勇的鬥爭，在國際學聯之領導下，全世界學生與全中國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不僅要解放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也會再同一陣線上，致力於解放全人類。⁶⁷ 從這段簡介可知，國際學聯是強調反帝與反戰並追求和平的組織，這樣的理念與中共宣傳的口號極為吻合。留日學生會運作逐漸傾向共產主義，左翼國際學生運動的大環境也是原因之一。

1949年間，學生報主要都是介紹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另外也曾經介紹日本民主青年團的活動。同年五四紀念前夕學生大合唱活動中，日本民主青年團中央合唱團曾前來參加。民主青年團是從青年共產同盟發展而來，其發展過程是由日本共產黨主導，所屬合唱團負責人關鑑子之文章刊載於學生報。根據報導，前述大合唱活動中，由關鑑子擔任鋼琴伴奏，臺灣學生呂水深指揮，中日學生大合唱「世界民主青年進行曲」，這些都是左翼學生運動。⁶⁸ 同年6月1日學生報第31號刊載，第一屆中華全國青年大會致日本學生運動與給全世界青年的公開信。信中呼籲：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在毛澤東的旗下前進。⁶⁹ 個別學生的動向無法掌握，但從學生報公然刊登這樣的消息，代表著同學總會與主要幹部已正式表明支持中共政權。此時，國民黨政府當然無法爭取到留日青年學生的支持。

（二）留日學生救濟金發放之糾紛

受到戰後國際學生運動影響，留日學生明顯出現左傾風潮，這種情勢原本就

⁶⁷ 〈國際学連の旗の下に 邁進せよ！世界の恒久平和へ〉，《中國留日學生報》24，1948年12月1日，第1版。

⁶⁸ 關鑑子，〈進む歌ごえ〉、〈同志よ固く結べ 五四前夜の大合唱〉，《中國留日學生報》29/30，1949年5月15日，第3版。

⁶⁹ 〈主張 日本学生運動に寄せて〉、〈全世界青年へのメッセージ 帝國主義は「紙老虎」、世界人民勝利の日〉，《中國留日學生報》31，1949年6月1日，第1版。

對國府不利，再加上屬於國府管轄之下的駐日代表團之顛預與腐化，也是讓學生唾棄國民黨政府的重要原因之一。⁷⁰ 代表團與同學會之對立，最主要原因是在於發放救濟金問題。戰後日本民生凋敝，留學生的生活困苦，同學總會成立後，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爭取經濟援助。當時由於匯兌不通，臺灣親人也無法接濟，幸好臺灣學生聯盟成立後，很快就爭取到優待非日本人的「特別配給（特配）」與救濟金，並透過交涉讓同學得以暫緩繳交學費。但是，這些都是救急辦法而已，日本政府的救濟金到 1946 年初就停止，許多學生必須另行設法才能渡過難關。臺灣鄉親也曾捐錢救助臺灣學生，但杯水車薪似乎沒有太大助益。⁷¹ 這時候謝南光雖積極為救濟留學生奔走，但實際成效不佳。⁷² 為了獲得長期而穩定的獎助學金，留學生與華僑總會只好不斷向代表團陳情。

根據《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記載，同學會陳情最初要求代表團賣掉已經收回的戰時日本在中國掠奪物資，然後以所得之款項來充當救濟金。這些包括藥物、桐油、羊毛等商品，特別是羊毛已經有經營紡織工廠之僑胞願意承購，總價約 14 萬 5 千美元，可充當留學生救濟金。沒想到代表團官員竟然以不法手段私吞，甚至利用這筆錢組織親國民黨之小組織，意圖分裂同學會。⁷³ 但是，從教育部的檔案中發現，出售的被掠奪物資並非羊毛而是毒品。檔案中顯示，代表團與教育部曾多次以電報往來討論救濟金事宜，由於出售的物資是鴉片與嗎啡，其價款之使用受到盟軍總部的限制，無法順利轉撥運用，加上發放的審核標準反覆地討論，以致救濟金遲遲無法發放。從 1945 年 12 月 14 日發出第一封國府官員指示發放救濟金電文，到 1949 年 11 月開始發放給學生，各部門電文往返討論將

⁷⁰ 有關駐日代表團的組織與腐敗的問題，楊子震已有詳細的分析。請參見楊子震，〈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國史館館刊》19（2009 年 3 月），頁 58-67。

⁷¹ 1948 年 1 月，學生報刊登一則針對臺灣學生聯盟（舊二部）會員的公告，文中說：「先前臺灣省父老送來救濟金，現已分別發給各地同學，救濟金共 13 萬元，每人 180 元（應為日元，當時日幣貶值嚴重），發放對象地方 252 名，東京 452 名，剩餘緊急救濟金由理事長林瑞聰保管。這次撥款借助謝南光先生、林清文先生奔走，以及李建星、吳修竹同學的幫忙，謹此致謝。為何會有這筆救濟金，尚無詳細資料。但透過此消息可知，當時同學會還能掌握到的臺灣學生至少也還有 704 名。」請參見〈舊二部會員に告ぐ〉，《中國留日學生報》16，1948 年 1 月 15、30 日，第 4 版。

⁷²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電教育部呈送留日學生名冊等件請予救濟〉，收於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一），頁 270-271；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69-70。

⁷³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70-71。

近四年。⁷⁴ 不論銷售的被掠奪物資為何，這樣的辦事效率，當然無法獲得留學生信賴。甚至在發放前夕，有關發放的方式還有爭議，學生報為此還在頭版進行批判。⁷⁵

留學生傳聞有關代表團負責人將救濟金中飽私囊的事情，並非只有被略奪物資銷售款部分而已。另外，當時因對日貿易受管制，獲准從事貿易的華僑，代表團都抽取 4% 的手續費，名義上是要救濟留學生，實際上卻從未發放。學生們得知消息後，前往代表團質問負責人張鳳舉，張氏此時才承認有這筆錢，但他竟推託要另組基金保管委員會，才能進行發放作業。學生們回到同學會後決議，要求將這筆已達 12 萬美元的基金，撥到同學會組成的「留日學生獎學會」，由獎學會來審查發放。⁷⁶ 經口述訪談得知，針對這個問題，因學生報在頭版報導，被點名的張鳳舉一怒之下，以違反出版法規為由向盟總提出檢舉，編輯人被訊問後飭回，學生報也幸好未被查禁。⁷⁷ 但同學會與駐日代表團的對立，至此已達無法挽回的地步。

1949 年 8 月，同學會的「留日學生獎學會」開始運作，公開獎學金申請辦法，對駐日代表團明顯造成壓力，但代表團還是緊扣著這筆錢，還是未見立即發放的規劃。同年 10 月 10 日，同學會與民促合力將原本要舉行的雙十節慶典，改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明確表達支持中共。在此情勢下，代表團為了爭取留學生之支持，才不得不從 11 月起發放救濟金，但一切為時已晚。

⁷⁴ 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一），頁 256-308。此外，有關如何救濟臺灣留日學生問題，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中也有不少相關檔案，包括如何匯款或救濟留日學生之辦法等質詢案。請參見臺灣省諮議會，〈請政府設法資助及便利匯送臺灣省留日學生學費案〉，《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次定期大會》，典藏號：001-01-06OA-00-5-3-0-00364，1948 年 12 月。

⁷⁵ 〈主張 救濟基金を民主的保管機関に〉、〈留日学生に福音 十四萬五千弗救済用に〉，《中國留日學生報》35，1949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兩文除了開心地宣布救濟金有著落的「福音」，同時也要求將救濟金交由學生團體來發放，充分顯露對駐日代表團的不信任。

⁷⁶ 〈留日学生救済基金 十二万ドルの行方は？ 奇怪な代表団の措置〉，《中國留日學生報》34，1949 年 8 月 1 日，第 1 版；〈中国代表団に疑惑 十二万ドルをネコババ〉，《華僑民報》3:2，1949 年 8 月 1 日，第 1 版；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70-74。

⁷⁷ 蔡朝焘，〈蔡朝焘先生手稿文件集〉（未刊稿）。

(三) 中共建國前後駐日代表團之失策

駐日代表團人員從事黑市買賣的腐敗行為，早已廣為僑民與學生所知，除了私吞救濟金問題，親國民黨政府的僑報被轉賣，也是同學會與代表團衝突原因之一。戰後，日本華僑經營的日報有兩種，一為在東京發行的《中華日報》，一為在大阪發行的《國際新聞》，⁷⁸ 兩報發行量最初各僅約三千份，主要負責人都是在日臺灣人。其中《國際新聞》左翼色彩鮮明，1947年以後親共的言論就日益明顯，而《中華日報》則屬支持國府的報紙。戰後日本新聞用紙不足，故採配額制，華僑為戰勝國民，故新聞用紙配額甚高，兩家報社合計可獲得高達50萬份的用紙。⁷⁹ 中華日報社長羅錦卿知道報社經營無利可圖，剩餘的用紙配額奇貨可居。1949年1月，羅氏竟計畫將報紙停刊，把配額售予讀賣新聞社。此一圖利自己的行為，引發社員抗爭與民促幹部聲援。社員先組成「從業員組合鬥爭委員會」，並發行宣傳報進行抗爭，而後羅氏雖然被迫繼續發行報紙，但不久還是私下將整個報社轉賣，由讀賣新聞社變更刊名發行《内外タイムス》。⁸⁰ 由於許多留學生在該報社就職或打工，這樣的結果自然引起許多學生之不滿。代表團無力阻止，社長羅錦卿政治立場又傾向國府，所有罪狀當然要由代表團承擔。

除此之外，1949年7月京都發生留學生無故被日警毆打重傷，前一年10月大阪也發生日警侮辱中國國旗事件。⁸¹ 對於這些事件，駐日代表團都未積極處理，無法撫平華僑與學生不滿的情緒，最後大家都將原因歸諸於國府的腐化與無能，如此造成華僑更加期待「新中國」的到來。早在上述風波發生前的1948年10月，同學會已進行一項問卷調查，經統計分析後顯示，留學生對共產黨的支持已高於國民黨一倍，雖然絕大部分都表示中立，但是有關國共內戰的結果，預料

⁷⁸ 1945年10月，《國際新聞》由臺灣人康啟楷等創刊，從週刊演變到三日刊，1946年改為日刊，為僑界報紙中最早創刊，發行量最大，其言論原本即較為左傾，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量採用新華社等通訊社之稿件，1959年因經營不善而倒閉。許淑真，〈國際新聞〉，收於可兒弘明、斯波信義、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227。

⁷⁹ 有關戰後華僑發行的報刊情況與新聞紙配給問題，請參見洪谷玲奈，〈戰後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形成：留学生との統合に関連して〉，《成蹊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32（2006年3月），頁1-32。

⁸⁰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74-275；〈違法取引を阻止、三月五日から新聞を發行〉，《中華日報闘争ニュース》，1949年3月13日，第1-2版。

⁸¹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272-276。

共產黨將獲勝的多出估算國民黨獲勝者七倍。⁸² 而後情勢日益明朗，再加上共黨宣傳之效力，大部分學生自然逐漸背棄國民黨政府。

如前所述，1949年10月10日，同學會與民促合力將原本要舉行的雙十節慶典，改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這個戲劇性的變化讓駐日代表團臉上無光，證明該團四年來的僑務工作一敗塗地。為了彌補爭取留學生之失策，代表團從11月起正式開始發放救濟金給留學生。這次補助計畫是給成績優秀與經濟困難者各200名，總計為400名，但實際審查相當寬鬆，給付金額的原則也不明確，而且每個月補助人數與對象均有變動，最後還追加十名給予最近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者。隔年6月，代表團由何世禮將軍接任團長，他開始採取嚴格審查辦法，凡思想稍有問題或成績欠佳者，均隨時停止補助，最後人數降到一百多名。藉著補助金發放的審查，他也另組一個在國府控制下的新留日同學會，排除所有親共學生。另外，為爭取學生與僑民支持，在其主導之下，1951年還曾舉辦留學生返國暑期研習會，1952年則組成由孫德成率領的華僑青年返國觀光團。⁸³ 雖然檔案記載說，參加者極力肯定這些活動，但是根據留日學生的證詞，卻認為這些返國活動剛好達到反效果，大家對國府在臺灣的統治更加失望。

與此同時，中共也大力進行拉攏留學生的行動，根據目前已經出版的教育部檔案之報告：中共留日學生總會慷慨地發放留日學生補助費，不僅提高價碼，而且也發放給新留日同學會之學生，企圖進行分化及收買國府管轄之學生。⁸⁴ 外交部的檔案顯示，類似這類留學生或華僑的爭奪戰，往後還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相關問題已超出本文範圍，而且都屬1950年以後之情況，故不擬在此繼續討論。

透過留日學生報內容到同學會動向之考察，戰後留學生左傾化的演變過程已經清楚地呈現。其中最具象徵性的變化，應該是學生報發行單位名稱的修改。留日學生報刊頭的「發行所」，原本是：「中華民國留日同學總會」，從1949年9

⁸² 〈1948年末綜合調查統計〉，《中國留日學生報》26，1949年2月1日，第3版。

⁸³ 〈外交部長葉公超函蔣經國關於留日學生津貼辦理情形及僑校近情〉，收於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二），頁15-17。有關何世禮接掌駐日代表團的情況，請參見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226-261。

⁸⁴ 〈行政院秘書處通知教育部中共分子在日活動近況之情形一件奉交參考〉，收於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二），頁558-568。

月 1 日第 35 號起，在沒有任何公開聲明下，被改為：「中國留日同學總會」。⁸⁵這雖然是一項小變化，但顯示留日學生總會在中共建國之前已經正式拋棄「中華民國」之名號，其背棄國府之決心極為明確。

六、結論

本文透過史料排比的整理，加上參考當事者之證言，最主要的成果在於釐清留日學生報為何出現日益左傾化之轉變。整體而言，學生報的左傾言論就是呼應中共的宣傳，1948 年間其主要內容以紀念五四相關之學生運動與魯迅相關之新文學運動為主，1949 年則進入「三反主義」的政治性宣傳，最後自然就歸結為支持新中國。亦即，經歷三階段變化的留日學生報，原為單純的「學術文化刊物」，而後轉變為關注中國內戰與學生運動的「時事評論刊物」，最後竟變成全面支持中共建國之「政治宣傳刊物」。

回顧這段學生報與學生會向左轉之過程，首先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存在。從學生會幹部與編輯人員、撰稿者的言論作歸納分析，共產黨秘密黨員應該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從人脈網絡來看，同學會幹部、次級團體「民中研」與「民促」等幹部，明顯結合在一起，其中多位在日臺灣人（包括舊學生會幹部）成為關鍵性領導人物。這群人透過學生團體與華僑團體的聯合運作，並發行報刊進行宣傳，因而得以主導留學生之左傾風潮。觀察這些人脈建構與宣傳的展開，不能無視共產黨組織運作的存在。當然，時代巨輪的轉動必然是多重因素所造成，共產黨幹部或許只是幕後的推力之一。除了這些秘密黨員的私下串連，公然的倡導也有不可忽視的力量，包括日本左翼文化人的言論活動、左翼國際學生運動的串連和宣傳等，也是促使留日學生左傾化的原因。

前述有關學生報之內容分析，大致驗證了言論左傾化的過程。比對 1949 年之留日學生報，其內容也大致呼應了僑界發行的《華僑民報》支持中共之論述，

⁸⁵ 在 1948 年 9 月 1 日發行的第 22 號，刊頭上「紀念九一八反法西斯國際學生大會」時，主辦單位以「中國留日同學總會」掛名，這應該是第一次使用，其目的不外乎是想擺脫「中華民國」。標註發行單位之變化，請參見《中國留日學生報》22，1948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中國留日學生報》35，1949 年 9 月 1 日，第 1 版。

國府無法改變其親共的趨勢，當然與國共內戰的頹勢有關。除此之外，國府與駐日代表團的失策，也是留學生轉而支持中共政權之重要原因。例如，對戰時「偽政權」派出「偽學生」的猜疑，相當程度引起出身中國大陸學生之恐慌與反感。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的宣傳與拉攏就很容易奏效。再者，由於未適時發放留學生救濟金，以致代表團被塑造為腐敗無能官僚集團之形象，這也是讓他們唾棄國民黨政府的重要因素。對臺灣的學生而言，從二二八事件到四六事件，可說是新仇舊恨糾結，要報此仇一定要推翻國民黨在臺的暴政。不少臺灣留學生是在這心下，迎接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並期待臺灣早日獲得解放。

臺灣留日學生的所謂左傾化現象，部分是對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認同，部分則是基於反日本殖民統治之中國民族主義，兩種思想脈絡的糾葛很難區分，透過學生報文本分析與相關考證，可以掌握時代思想或風潮之變化，但卻無法論證個別留學生內心認同之轉變過程。⁸⁶ 如果僅就1945-1949年間的觀察而言，全體留學生中左傾學生的人數或比例也很難估算。但是，若將觀察範圍延續到1950年代冷戰時期，左傾臺灣學生的動向就很清楚了。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支持共產中國，不僅發表具體言論，甚至採取實際行動。1950年5月，國府獲得的東京密函情報中指出：「在日華僑及留學生大部傾向中共，共方並派有工作人員多人潛伏工作，並盡其歪曲宣傳之能事，留日學生會華僑總會等完全為其控制。」⁸⁷ 若不討論政治立場問題，這樣的描述還頗為符合實際情況。而且，在爭奪僑民留學生支持徹底失敗後，國府似乎也體會到宣傳不力是一項重要原因。

而後，勝者的攻勢並未止歇，隨後中共呼籲華僑與留學生歸國服務，對國府的打擊更大。1952年間，中共因隔年計畫實施「國家建設第一次五年計畫」，所以開始呼籲華僑與留日學生返國投入建設行列。結果，從1953年起出現了一波「集體歸國」的熱潮，到1958年間包括留學生總人數約達4,000人，其中臺灣人約佔三分之二。⁸⁸ 根據統計，僅以留日學生的情況來看，其移動大致可分三個階

⁸⁶ 有關特定臺灣知識分子的認同轉折，日本新聞界人士本田善彥的著作雖非學術論著，但對於複雜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糾葛之討論，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請參見本田善彥，《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6），頁151-283。

⁸⁷ 〈行政院秘書處通知教育部抄留日僑民及留學生情形〉，收於林清芬編，《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二），頁523-525。

⁸⁸ 詳細人數之統計與分析，參見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日本神戶華僑的社會變遷〉，頁173；符順和，〈戰後華僑の帰国〉，收於可兒弘明、斯波信義、游仲勳編，《華僑・華人事典》，頁409。

段，第一階段是從 1950-1952 年，大約有 200 名前往中國，1953-1955 年的第二階段，留學生共計達 242 名，含華僑總人數達 3,000 人，第三階段是 1956 年以後數年，大約 100 名左右前往中國。經過三階段的熱潮，到中國的留學生總計達 500 多名。⁸⁹ 這些留學生中，臺灣學生總數不詳，但估計約為三分之二，這是戰後臺灣留日學生左傾化的結果。當然，中共方面熱情的接待與優待措施頗具吸引力，因篇幅所限，這部分在此無法詳細討論。

綜觀現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許多受日本教育青年，無法接受國府統治，其結果不是滯留國外，就是設法前往中國，而返臺者之中許多人就成為政治受難者。曾擔任學生會也是華僑總會幹部的吳修竹在回憶錄中，直接了當地說：戰後初期留學生或僑民與國民黨，始終處於對抗的關係，國民黨讓大家徹底失望。⁹⁰ 日本僑界左傾言論的激盪，國民黨政府形象又確實不佳，再加上負面流言可能具有之加成效應，本土留日人才當然也就大量流失了。例如，東京醫專畢業的許燈炎，也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由於許氏熱心參與學生會活動，而且也曾在學生報上發表文章，⁹¹ 據口述訪談得知，他在學生會中人緣相當好。許燈炎畢業後返臺，進入熱帶醫學研究所服務，1950 年間被捕，隔年 2 月 14 日遭到處決。⁹² 林鐵錚回憶說：許燈炎要返鄉時，大家都極力反對，因為他擔任學生會幹部時曾與代表團發生衝突，早已被列入黑名單，回去相當危險。但是，因為女朋友已經先行返鄉，他還是不顧大家的反對返鄉。後來不知何故被捕，被監禁一段時間後，其女友接到通知，要她前往監所保釋，沒想到抵達後才知竟是要她領回屍體。這個消息傳回東京，讓大家都非常震撼，自己也因此不敢返鄉了。⁹³ 這些傳聞的細節應該有

⁸⁹ 這個數字是參考曾任同學總會主席的郭平坦，其撰寫的「神戸出生臺籍華僑子弟」分類統計。請參見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著、陳焜旺主編，《日本華僑・留學生運動史》，頁 112-130。

⁹⁰ 吳修竹，〈私の履歷書〉，頁 57。他回顧這段時期在日與國民黨官僚鬥爭的經驗時，特別強調：「看到中華『民國』官僚的蠻橫粗暴，再聽到國內的情勢，人心遠離國民黨是必然的發展。再加臺灣二·二八事件，抗議國民黨獨裁的聲浪當然也澎湃湧現。」原文：「中華『民国』官僚の横暴を目にし、また国内の情勢を知るに及んで、人心が国民党を離れたのは必然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加えるに台湾二・二八事件である。澎湃として国民党の独裁に対する抗議が沸き上がった。」

⁹¹ 許燈炎，〈科学 同姓結婚とその遺伝学的考察〉，《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3，1947 年 3 月 10 日，第 2-3 版。

⁹²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上冊，頁 58-59。

⁹³ 採錄蔡朝忻先生轉述林鐵錚先生回憶錄之內容。

不少誤差，但他所形容以及強烈感受到的驚恐氣氛，相當的鮮明。林鐵錚因而轉往中國，這種白色恐怖氣氛不知阻斷多少臺灣青年返鄉之路。

戰爭期成長世代之菁英大量流失，對臺灣社會造成何種負面的影響，實在難以估算。但是若從思想層面來推論，我們可以發現海外臺灣人的政治動向，在二二八事件衝擊下，並非直接轉向臺灣獨立運動，其中轉而支持新中國的比例相當高。這個事實或許可以稱為臺灣政治史研究之「失落的環節」。過去臺灣政治史研究過於重視島內本土菁英的動向，忽略了海外臺灣人的活動，尤其是臺灣留日學生的政治動向。至於找回這個失落環節後，臺灣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整體面貌為何，則尚待今後各方研究者的進一步探討。

引用書目

- 《中華日報鬭爭ニュース》。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 《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旬報》（1947年5月1日改為《中華留日學生報》，1948年5月4日改為《中國留日學生報》）。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 《華僑文化》。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 《華僑民報》。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 吳修竹，〈私の履歷書〉（自製版，1997年）。
- 蔡朝焜，〈蔡朝焜先生手稿文件集〉（未刊稿）。
- Altbach, Philip G. (P. G. アルトバック) (著)、喜多村和之 (譯)
1971 《政治の中の学生：国際比較の視点から》。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大森実
1975 《赤旗とGHQ》。東京：講談社。
- 川島真
2009 〈過去の浄化と将来の選択：中国人・台湾人留学生〉，收於劉傑、川島真主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頁31-51。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日本華僑華人研究會（編著）、陳焜旺（主編）
2004 《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埼玉：日本僑報社。
- 王雪萍
2009 〈留日学生の選択：「愛国」と「歴史」〉，收於劉傑、川島真主編，《1945年の歴史認識：「終戦」をめぐる日中対話の試み》，頁203-232。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可兒弘明、斯波信義、游仲勳（編）
2002 《華僑・華人事典》。東京：弘文堂。
- 本田善彦
2006 《日・中・台視えざる絆：中国首脳通訳のみた外交秘録》。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 何義麟
2010 〈戦後在日臺灣人之處境與認同：以蔡朝焜先生的經歷為中心〉，《臺灣風物》60(4): 161-194。
- 周南京（主編）
1993 《世界華僑華人辭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清芬（編）
2001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留學日本事務（一）、（二）。臺北：國史館。
- 林清芬
2006 〈戰後初期我國留日學生之召回與甄審（1945-1951）〉，《國史館學術集刊》10: 97-128。
- 施惠群
1992 《中國學生運動史（194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郁雅

2005 《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的變動(1945-1949)》。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清華寮OB會(編)

2002 《清華寮OB會會報：第一期》。東京：清華寮OB會。

許瓊丰

2011 〈在日臺灣人與日本神戸華僑的社會變遷〉，《臺灣史研究》18(2): 147-195。

郭承敏

1997 《秋霜五〇年：台灣・東京・北京・沖繩》。那覇：ひるぎ社。

陳來幸

2011 〈在日台湾人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脱日本化：戦後神戸・大阪における華僑社会変容の諸契機〉，收於貴志俊彦編，《近代アジアの自画像と他者：地域社会と「外国人」問題》，頁83-105。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陳英泰

2005 《回憶・見證白色恐怖》，上冊。臺北：唐山出版社。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

2009 《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菅原幸助

1991 《日本の華僑》。東京：朝日新聞社。

楊子震

2009 〈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初探戰後中日、臺日關係之二元架構〉，《國史館館刊》19: 58-67。

楊國光

1999 《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東京：露滿堂。

2001 《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

楊威理

1993 《ある台湾知識人の悲劇：中国と日本のはざままで：葉盛吉伝》。東京：岩波書店。

翟作君、蔣志彥

1996 《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劉智渠(述)，劉永鑫、陳萼芳(記)

1995 《花岡事件：日本に俘虜となった中国人の手記》。東京：岩波書店。

鄭宏泰、黃紹倫

2008 《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

渋谷玲奈

2006 〈戦後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の形成：留学生たちとの統合に関連して〉，《成蹊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32: 1-32。

Left-wing Views and Political Sentiments of Taiwanese Students in Immediate Post-war Japan

I-lin Ho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students from Taiwan pursuing studies in Japan were considered imperial subjects. With the end of WWII, their status became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in Japa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uch change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future.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employment prospects back in Taiwan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m as graduates from Japanese universities. From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rough personal interviews,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m were unabl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due to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Taiwan.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228 incident in Taiwan, plus the widespread left-wing views in Japan and especially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there,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students in Japan harbored negative sentiments agains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1949, the Communists won victory in the civil war of China and found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l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relocate to Taiwan. In the beginning, many Taiwanese students in Japan had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 "new China", and even migrated to the Mainland in groups.

Analysis of students' newspapers and overseas Chinese publications reveals that the prevailing left-wing view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ir preference of the Communists. Even though it was the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who fostered such left-wing inclin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st propaganda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e lack of a proper policy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 these overseas Taiwanese students also drove them to be pro-communists.

In general, most Taiwanese students who went to Japan during the war and those who continued their studies in the aftermath of WWII eventually settled down in Japan. Among those who returned to Taiwan, some suffered persecuted and rarely did they get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These post-war developments revealed that the left-wing inclination among Taiwanese students in Japan wa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Taiwan lost many local elites. This article focuses mainly on tracing the emergence of left-wing views among the overseas Taiwanese in Japan. Future studies will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left-wing thinking in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drain of local elites.

Keywords: Taiwanese Students in Japan, Taiwanese in Japan, The Chinese Students' Press in Japan, Overseas Chinese in Japanese, Press Campaign, Left-wing